

陳夢家《中國古文字學導論》譯注

王波濤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摘要

本文是對陳夢家《中國古文字學導論》英文講義稿的翻譯和注釋。原書分三章：〈文字學史〉、〈漢字的起源〉、〈漢字的結構〉。第一章梳理了小學學制、早期文字學、《說文》的成書和以《說文》為中心的文字學史。第二章認為漢字起源於四千年前，字形源於圖畫，「文」、「名」、「字」是表示漢字的三個術語，對應漢字的三種基本類型和三個發展階段。第三章著重論述了象形字的形體變化、字形與語音的關係、「意」「義」的區別、形聲字的發展等。此書對於研究陳夢家的文字學理念和一般古文字學史，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陳夢家、中國文字學、文字學史、譯注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Chen Meng-jia'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aeography*

Wang Bo-tao

(Beij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alaeography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English lecture notes of Chen Meng-jia'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aeography*. The original book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Historical Survey”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ructure”.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early palaeography, the completion of “Shuowen” and the history of palaeography centered on “Shuowen”. Chapter 2 believes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originated four thousand years ago. Characters form originated from pictures. “Wen” (文), “ming” (名) and “zi” (字) are the three terms that represent Chinese characters,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basic types and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pictographic fo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s and phonetic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i” (意) and “yi” (義), the development of phonetic-compound, etc. This book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en Mengjia's palaeography idea and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Palaeography.

Keyword: Chen Meng-jia, Chinese Palaeography, history of palaeography,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凡例

- 一、本書據「陳夢家著作集」《中國文字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所收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aeography* 翻譯。英文本編寫於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為未完稿。參文末「譯後記」。
- 二、英文本照顧外國學者知識背景，有些表述如「許慎的兒子將其父親的著作進獻於皇帝時所寫的奏章」，漢譯本按漢語引書習慣徑譯為「許沖〈進《說文》表〉」。其他文字皆據原文直譯。
- 三、「作者注」原來括注在正文的相關位置，譯本保留這種形式，將作者注改為仿宋體，與正文相區別。
- 四、英文本對引用漢文古籍，皆譯為平白易讀的英文。漢譯本據英文本轉譯為現代漢語，在「譯者注」中注出古籍原文和出處。惟《漢志·小學類》和《說文解字·敘》篇幅較長，不再附注原文。
- 五、譯者注對文中的疑難問題加以解釋說明，或引一九三九年《文字學甲編》（簡稱「甲編本」）和一九四三年《中國文字學》（簡稱「重訂本」）相關表述相互比較。也會注出一些後出的研究成果，供讀者參考。
- 六、書中的專門術語除在譯本正文括注原英文譯名外，又見書後「附錄一 英漢術語對照表」。
- 七、原書中的威氏拼音譌誤較多，「附錄二 原書誤拼譯名更正表」是對威氏拼音的更正。

年代表

商

盤庚以前 西元前？年 —— 西元前1300年

盤庚至商末 西元前1300年 —— 西元前1027年

西周 西元前1027年 —— 西元前771年

東周

春秋 西元前770年 —— 西元前481年

戰國 西元前480年 —— 西元前222年

秦 西元前221年 —— 西元前207年

西漢 西元前206年 —— 西元9年

新莽 西元9年 —— 西元24年

東漢 西元25年 —— 西元220年

第一章 文字學史¹

第一節 引論

中國古文字學（Chinese palaeography）是對古文字進行歷史的分析的研究²。本書主要關注如下四方面內容：（一）文字的起源、結構和分類，（二）字體的歷史和演變，（三）重要的字書，（四）古器物銘文³，此四者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中國古文字學研究的基本材料有兩種：一是商朝到漢朝之間的甲骨刻辭、青銅器和其他古器物銘文。二是漢以前至今的字書、韻書和其他著作。第一種材料更為重要，因為它承載著當時紀念物（monuments）⁴的原始文本（original text）。第二種材料的重要性主要是它起到了把古文字和今文字連接起來的作用。然而，反復抄寫和印刷產生的訛誤，使此種材料必須輔之以文本校勘（textual criticism）。

近年來，中國古文字學研究已經成為中國大學中文系開設的最重要的課程之一。中文系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中國文學，另一個是中國古文字學和語文學（philology）。古文字學講授的內容如下：

1. 中國古文字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aeography）

（1）漢以前

（2）漢以後

¹ 譯者注：原題「*Historical Survey*」（陳夢家：《中國文字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61），直譯為「歷史的概述」，今據文意為文字學史，故改題。但陳氏文字學史，緊緊圍繞《說文解字》為中心，故視為《說文》學史未嘗不可。

² 譯者注：關於古文字學研究的方法，「重訂本」第四節頁244-245，有詳細論述：「古器物銘文大半可以考出一個相對的年代，根據同一字而見於不同年代的銘文，可以發現一個字的歷史，所以我們研究的方法之一是歷史的。對於字的認識，推求它古代的形式和它古今的變易，需要由已識部分推認，偏旁的分析是必要的，所以研究方法之二是分析的。」還提到綜合的、演繹的方法。

³ 譯者注：（一）即本書二、三兩章，（三）見第一章，（二）、（四）本書沒有專題討論，「甲編本」有。

⁴ 譯者注：關於古文字的分類，李零認為應分為「記錄性」和「紀念性」（monumental）的兩類，引《墨子》「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說：「中國的記錄文字主要是簡帛類的文字，紀念文字主要是金石類的文字。如兩周金文和秦漢碑銘，就是中國紀念文字的典型。」《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頁41-43。陳夢家撰寫此書時，面對的古文字材料大都是鑄刻在「硬材料」上的「銘文」（inscription），他大概是最早使用「monument」（紀念物）來稱述中國此類文字的載體的。

2. 中國古文字學研究 (Research in Chinese Palaeography)

(1) 銘文

(2) 字書

3. 古文字學史 (History of Palaeography)

本書旨在作漢以前各階段古文字的研究，因此，漢以後文字的演變不包括在本書之內；當然，研究漢及漢以前時期的中國學者，對漢以後的各項研究一直都很重視。

由於中國古文字學的術語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暫時有必要定義或著重新定義一些術語。作為工作的基礎，這些術語會在整本書中不斷用到。

(一) 術語「字」(character) 的意思是由一定數量的筆畫 (strokes) 組成的漢字書寫的獨立單位 (independent unit)。可分為三類：1. 「刀」是本身是由兩個筆畫組成的一個單位。2. 「利」是由七個筆畫組成的兩個單位，在這個字裡，兩個單位是相互依賴的。當把它們分開時，就成為相互獨立的單位，表達兩個不同的意義。3. 「刃」是由三個筆畫組成的一個單位，左邊的一點⁵是一個本身沒有意義的依賴成分 (dependent part)。顯然這三類字中，第二類字還包含那些由兩個以上獨立單位組合而成的字。給定文字的筆畫組合就是該字的「字形」(form)。

(二) 術語「詞」(words) 是指字組 (group of characters)，包括同一個字的重複出現⁶。在詞語中，文字的形體和類型無關緊要；由四個詞組成的短語中，單個的「詞」跟「字」是一樣的。

(三) 術語「字體」(script) 涉及三個因素：1. 時代：字體隨時代不同而不同，例如西周字體，秦代字體，等等，是很不一樣的。2. 風格：根據書寫目的的不同而不同；用在兵器上，印章上，或政府公文上的文字。3. 「書手」(「Writers」)：特定時期的字體表現了特定社會階層書手的個體特性。如官員使用「篆書」，文吏使用「隸書」。

(四) 術語「文字」(writing)，「字體」與「文字」的區別，跟「字」與「詞」的區別相似。文字的涵義是廣泛的，在「字體」上有區別的，在「文字」上是沒必要的。「文字」是一個包括所有「字體」的一般術語。

⁵ 譯者注：英文本頁263作「right-hand point」，今正為「左邊一點」。

⁶ 譯者注：比如疊音詞。

第二節 小學和六甲

較早對文字產生興趣的漢代學者，沒有要創造一個古文字學領域的想法。只是在極為緩慢和長期的研究中，這一特定類型的研究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因此，目前對古文字學萌芽時期的歷史還沒有清楚的認識，我們嘗試勾勒出它發展的大致歷程。

在傳統中國古文字學中，這一學科被稱為「小學」；小者，微小，幼小；學調學校，學習。小學和大學這兩類學制（educational system）可能在商代就存在了，而在西周則可以確定是存在的。在兩件西周青銅器《大禹鼎》和《師夔簋》中，出現了「小學」一詞，指王室的「初級學校」（“the primary school”）。遺憾的是沒有充足的材料來說明西周時期這種學制的細節。東周時期的證據也同樣貧乏。

關於學制的零散信息可以從文獻中收集到。由於文獻本身不會比漢代更早，即使能據此推測出較早時期的情況，它也最可能反映的是漢代的。

《禮記·內則篇》說：男孩「六歲時，教他數字和方名……（當他）九歲時，教他六旬的名稱。（當他）十歲時，他就出去找老師，住在外面，學習書寫和算數。」⁷《漢書·食貨志》說：「（男孩）八歲入學，學習六十干支（sexagenary cycle），五方名，書寫和算數。」⁸崔寔的《四民月令》說：「一月，硯臺的冰融化，讓男孩們到小學，學習書寫篇章（原注：『篇章』是指六十干支、九九乘法表〔the multiplication tables〕、《急就》、《三蒼》等。）」⁹「十一月，硯臺的水結冰，讓男孩們到小學，誦讀《孝經》、《論語》、篇章、小學。」¹⁰最重要的

⁷ 譯者注：《禮記·內則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538。

⁸ 譯者注：《漢書》卷三十四〈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122。

⁹ 譯者注：《四民月令》：「正月，研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書篇章。（原注：篇章謂《六甲》、九九、《急就》、《三蒼》之屬）」陳夢家譯文「learn to write the rhymed chapters」即「學書篇章」見〔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3引，而《齊民要術》、《太平御覽》引無「書」字。石聲漢校注云：「依『本注』的說明，篇章是《六甲》、《九九》、《急就》、《三倉》之屬，《急就》、《三倉》等字書，應當學會書寫，《九九》是算學初步，僅僅書寫不夠，必須領會、熟練。再與上文『學《五經》』對比，也無必要在『學』下增加分動詞。因此刪去『書』字。」《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0。

¹⁰ 譯者注：《四民月令》：「十一月，研水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小學。」見《玉燭寶典》，頁378引。《齊民要術》作「入小學」，石聲漢校注云：「可能『入小學』應在『讀《孝經》……』之上。」《四民月令校注》，頁72。〔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已將「入小學」提至「讀《孝經》」前（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480。陳夢家譯文「the boys are ordered to go to primary school」似為擬補內容，他認為句末「小學」是篇章的通稱。「重訂本」稱「漢代所謂小學為字書篇章的通稱，如《藝文志》『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但有時小學與篇章並舉，如《四民月令》讀『篇章小學』。」頁

是崔寔的表述是對東漢學制的真實記錄。《論衡·自紀》即王充的自傳，稱「他六歲時，老師教他學習寫字；八歲時離開學校（即書館）。」¹¹《太平御覽》引《會稽典錄》說，「在七歲時，老師教（他）書寫和算數。」¹²早於此的《周禮》，寫理想中的學制，提到所謂「六藝」，包括六種技藝：禮節，音樂，射箭，駕車，書寫和算數。從崔寔描述的東漢學制看，當時小學的內容為六藝中的後兩項：書寫和算數。此在《大戴禮·保傳篇》中，也被稱為「小藝」。

根據《四民月令》的原注（作注者未詳何人）¹³，篇章包括以下內容：

（一）《六甲》，六十干支表。

（二）《蒼頡篇》，李斯所撰的押韻篇章，要求所有兒童誦讀。現在僅存一些片段。在中國，蒼頡是傳說中文字的發明者。

（三）《急就篇》，西元前四十八至前三十三年由史游編撰的篇章¹⁴，它是至今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漢代篇章。

（四）雜錄（Miscellanies）。

這些篇章是中國字典的濫觴。（二）、（三）兩項跟漢代的字書有關，後文還會提到。「六甲」跟字書有點不同，但也極為重要。

「六甲」是中國人稱呼六十干支的名字。六十干支是由以「甲」起首的十天干（celestial stems）系列和以「子」起首的十二地支（earthly branches）系列，一對一循環地相互結合，產生六十對序列；即十進制的系列循環了六次，

215. 張政烺以《寶典》本為是，《要術》誤多「入」字，張氏認為「小學」指「《六甲》《九九》」而言，是漢代小學的基礎知識，十一月復讀「篇章小學」者，是因為「二者皆四民終身日用所須，未可荒廢，束之高閣，故仍誦讀其文辭，所謂溫故而知新也。」〈六書古義〉，《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頁4-5。

¹¹ 譯者注：《論衡·自紀》：「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1378-1379。今按，「出於書館」似與「出就外傳」不同，桂馥《札樸》卷六：「《論衡·自記篇》，充為小兒，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馥謂充以學書之館為書館，其受《論語》《尚書》之處別是一館，不稱書館矣。」是王充六歲學習書寫，八歲手書既成而離開書館，故陳夢家譯為「he left school」。

¹² 譯者注：〔晉〕虞預著，周樹人輯：〈王充〉，《會稽典錄》卷上：「七歲，教書數。（《御覽》三百八十五）」，《四明叢書》第七輯，第一冊，頁10下-11上。

¹³ 譯者注：石聲漢把《四民月令》舊注分為「本注、賈注、杜注」，認為「本注，假定係崔寔自己所加注解。」又說：（舊注）「即《要術》與《寶典》現存本中已有的注。這些注，究竟是誰作的，無從肯定；我們暫時歸給崔、賈、杜三人的辦法，止能作假定看待。」《四民月令校注·校注例》，頁4-5。繆啟愉說：「本書正文下小字是原有注文，但不一定全是崔寔自注。」《四民月令輯釋·凡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年），頁5。

¹⁴ 譯者注：此「篇章」英文本作「rhyme book」，頁266。文中別處用來指「韻書」，「篇章」一般譯作「rhymed chapter」。

十二進制的系列循環了五次，總有不同的組合關係產生，這個週期纔完成。第一對是「甲子」，所以六十干支也被稱為「甲子」。在六十對中，甲重複了六次，完整的周期通常稱為「六甲」。商代曆制以六十干支代指六十天，或兩個月。中國西北考古調查曾發現殘破的漢代六甲文本，寫在三種材料上：（一）竹簡，（二）木札和（三）栝。其中栝是一種三棱形長木條，一端削平來寫章節符號，並穿孔編線。這三種材料的所有面或任何一面都能用來書寫，每一面可寫二十或二十二個字。六甲是用兩個字表示一天，用二十二個字結合成六十對，就有一百二十個字。如果寫到竹簡或木簡上，正反面皆用來書寫，每一面寫二十個字，則寫完六甲需三隻簡。同樣的方式，寫完六甲需用兩隻栝。考古發現的碎片上每面就是寫二十個字。即是說，每一面用來寫十個日名。據《南齊書·顧歡傳》：「顧歡六七歲時，他用三隻竹簡書寫六甲。」¹⁵因為三簡有六面，我們可以假設每面用來寫十日名。據《周禮·占夢篇》賈公彥¹⁶《正義》引《鄭志》，可知六甲分為六篇，每篇包含十日名。第一篇叫《甲子篇》，因為第一日名叫甲子。同樣的道理，第五篇叫《甲辰篇》。¹⁷據《隋書·李諤傳》和《李太白文集》的記載可知，六甲是兒童的教材。已知秦代有三種這類小學教材，且知漢代的教材是每六十個字一章。現存東漢《急就篇》，每章六十三字。據稱，秦代的三本教材，改編自西周晚期宣王太史所撰的一部《史籀篇》。《史籀篇》的形式很可能跟《蒼頡篇》相似，即每六十字一章。我們知道，竹簡或木簡的長度允許寫六十個字，用兩隻栝或三隻簡書寫六十日名非常合適。似乎六甲是使用這種分篇方式的第一個系統，因為三乘二十正好等於「干」和「支」的組合數，新的一章必須重新開始。有可能六甲是早於《史籀篇》的。¹⁸

有理由相信，甲骨中發現的干支表或甲子表，和在竹簡和栝上發現的一樣，實際上是學習六甲的習作。有些甲骨干支表，毫無疑問是初學者的習刻。目前，其他的習作也間有發現，但六甲最為常見。

據最近研究，《周禮》不是周代作品，而成書於周末，或更可能在秦漢之間。它描述的是理想中周代的統治者和貴族，而不是事實上的。編者取用的材

¹⁵ 譯者注：《南齊書》卷五十四〈顧歡傳〉：「歡年六七歲書甲子，有簡三篇。」（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928。

¹⁶ 譯者注：英文本頁268作「孔穎達」，今正。

¹⁷ 譯者注：《周禮注疏》卷二十五〈占夢〉：「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頁381。

¹⁸ 譯者注：本段內容可參看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301。

料，有些要早於成書時代。¹⁹《保氏》（保氏是一種教育官員）篇，有關於所謂「六藝」的記載，「六藝」中有兩項內容是「六書」（Six Writings）和「九數」（Nine Calculation）。漢代學者把「六書」解釋為「六種造字類別」（six categor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s）。《周禮》六書的原始涵義，僅僅是「六種文字書體」（the six types of writing）。班固《漢書·藝文志》所用「六書」的概念，似乎義指「六種造字方法」（six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characters），這一解讀來自劉歆。班固用「六體」指「六種文字書體」，這樣就把六書和六體混同了，因為「書」意為「文字」（writing），「體」意為「書體」（type）。後來，許慎《說文解字·敘》對「六書」有兩種用法：（一）用來指「六種造字方法」，（二）跟班固的「六體」同義。²⁰同樣在《藝文志》中，班固著錄了一部叫《八體六技》的書。此書，也可能是幾種書，現已不存。班固把此書放在《史籀篇》之後，《蒼頡篇》之前，因為班固的分類法是按年代順序排列的，此書的時代可能在東周和秦之間。八體謂「八種字體」（eight classes of script），六技謂「六種書寫方法」（six methods of writing）。《說文·敘》記載，「八體」是漢代考察政府文書候選人的基本內容。有可能秦代也使用相似的方式，因為漢代的許多制度是繼承秦的。「六技」可能跟「六書」相同，它在南北朝和唐代被稱作「六文」。²¹

字書叫做篇章，因為讓兒童模仿和記誦的文字是寫在簡上的韻文。章有「韻」的意思。之後，篇章引申指「章節」。章和程組合起來有「模範」的意思，《廣雅·釋器》說「篇章謂書寫的模範」²²顏師古《急就篇注敘》說「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為了便於模仿書寫。」²³南朝齊王僧虔《論書》說，著名書

¹⁹ 譯者注：錢穆考證《周禮》為戰國晚期作品（〈周官著作時代考〉，《燕京學報》第11期〔1932年〕）。梁啟超說：「這書總是戰國秦漢之間，一二人或多數人根據從前短篇制度的書，借來發表個人的主張。主張也不是平空造出來的，一部分是從前制度，一部分是著者理想。」《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109。

²⁰ 譯者注：班固說漢律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許慎則把此「六體」歸為王莽時的「六書」，故六書可指書體。

²¹ 譯者注：對於「六書」的原始涵義，英文本解釋為六種文字書體（type）。不過陳氏又說「六書」是「六技」（六種書寫方法）。兩者統一起來解釋，就是用六種書寫方法寫成的六種書體。「重訂本」說：「《保氏》的書數就是漢世的書計，書是書寫，數是計數，所以《保氏》的六書實在指書法，考《漢書·藝文志》小學類有《八體六技》一書，次於《史籀篇》之後，《倉頡篇》之前，可知是先漢的書。據《說文解字·敘》『秦書有八體』，《八體六技》當是秦代的八體，六技當指六種書法。」《中國文字學》，頁214。陳夢家認為《周禮》是戰國末至秦漢之際的著作，故用六技當《周禮》的六書。今按，要求掌握六種書寫方法或字體，如此高難度，似不合秦漢小學的教學實際。張政烺《六書古義》與陳夢家思路相似，認為《保氏》的書、數就是漢代小學的書、計，故以六甲當六書，九九當九數。

²² 譯者注：《廣雅·釋器》「篇章，篇程也。」今按，斷句當為「篇、章、篇，程也。」〔清〕錢大昭《廣雅疏義》：「篇、章、篇，皆所以計課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611。

²³ 譯者注：〈急就篇注敘〉「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俾效書寫。」（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

家鍾繇的字體有三種，第二種叫「章程書」，是用來教小學的。²⁴

正因為書寫和記誦是在小學教授兒童的初級課程，所以對文字的研究也稱為「小學」。儘管這個歷史術語是不正確的，但它仍沿用至今，而且是古文字學研究最初的一步。現在很清楚，教育是以學習文字為開始的。需要指出的是，現今研究中國文字乃是研究中國文化最基本的手段，也是教育的起點。

第三節 《說文》以前的小學資料

關於押韻篇章、字體、造字方法最早的記載，見於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之後在許慎《說文解字·敘》中有一些補充材料和記載。最相關的部分會在下文翻譯出來。對比兩篇序文，展示出巨大的相似性，表明它們可能有共同的來源。關於這一點還可以考慮下面兩種情況：第一，許慎和班固出於各自的目的分別改編了劉歆的原著，並增加了他們認為需要補充的內容；第二，許慎沒有改編劉歆的著作而是直接改編自班固，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了更正和補充。兩種情況的結果都是一樣的。需要注意的是，儘管許慎的著作在年代上是晚於班固的，但並不意味著許慎要完全採納班固的觀點。

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被認為是對劉歆所作目錄學著作《七略》的完整複製，並補充了些新材料。劉歆的著作本身又是對其父親劉向所著《別錄》的改編。《別錄》一書只能從他書的引文中瞭解到一些。其中有如下兩段比較重要的引文可與班書對比：

（一）周宣王的太史作大篆。（出嚴可均輯本）²⁵

（二）所有的經書都是古文字體（書寫的）。所有文字有六項根本（即是說，可以分析為六類）：（1）象形、（2）象事、（3）象意、（4）象聲、（5）轉注、（6）假借。又有六種字體：（1）古文、（2）奇字、（3）篆書、（4）隸書、（5）繆篆、（6）蟲書。秦朝法律官員的事務（注：班固寫作「官獄」，指「官員和法律的事務」〔officer's and legal affairs〕；《別錄》引文則倒寫作「獄官」，可以視為一個詞，指「法律官員的事務」〔legal officials' affairs〕）極大

²⁴ 譯者注：〈論書〉「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御覽》七百四十八）」《全齊文》，頁84。

²⁵ 譯者注：《別錄》：「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文選·魏都賦》注）」《全漢文》，頁392。

的增加，文字簡化並且方便（書寫），（隸書）是用在囚犯事務中的，因此被稱為隸書（隸指囚犯）。（出荀悅《漢紀》）²⁶

這兩段同見於劉歆和班固的書中，表明班固的書依據了前人的著作。

《漢書·藝文志》是已知尚存的班固時代的目錄學著作。書名之後的文字是班固的原注，後面圓括號裡的文字是我們的注釋。「篇」在這有兩種用法：（一）出現在書名中的，如《蒼頡篇》，並不指數目，（二）指一部書的單位，如《史籀》十五篇，這個意義上的「篇」相當於「編」。前者的本義是「竹簡」（bamboo slip），後者指用線或皮繩將簡「編聯到一起」。或許「卷」（fascicle）跟這個詞的意義最接近。²⁷我們會一直用「篇」這個詞，而不把它譯為英文。而「章」始終翻譯為「chapter」。

下面是《漢書·藝文志·小學》的目錄及小序的翻譯：²⁸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注：術語「大篆」指篆書較古的字形。它要比所謂「小篆」的時代早。限定詞「大」和「小」是指時代上的先後。²⁹）十五篇，建武時期（西元25-56年）佚失六篇。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前七章是秦丞相李斯所作。《爰歷》六章，車府令（the Chief Officer of the Chariots）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²⁶ 譯者注：《漢紀·前漢孝成皇帝紀》二卷第二十五：「凡經皆古文。凡書有六本，調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有六體，調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也。秦時獄官多事，省文從易，施之於徒隸，故調之隸書。」（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436。

²⁷ 譯者注：陳夢家對《漢志》「篇」字含義的區分，根據其出現的位置，一指內容，一指載體，後者相當於「卷」。李零認為作為單位的「篇」也是指內容的，「卷」指載體。他說：「篇者是就文字言，寫完一篇算一篇，按內容劃分；卷者是就載體言，簡帛收束，以手持為便，卷成一卷算一卷，兩者未必相等。目中所錄，凡稱篇者，都是竹書；凡稱卷者，都是帛書或帛圖。」《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頁10。

²⁸ 譯者注：《漢書·藝文志·小學類》，頁1719-1721。這裡不再附注原文。

²⁹ 譯者注：陳夢家關於「大、小」指時代先後的論述，與後來啟功的說法相似，啟功說：「每一個時代中，字體至少有三大部分：即當時通行的正體字；以前各時代的各種古體字；新興的新字體或說俗體字。以人為喻，即是有祖孫三輩，而每一輩中又有兄弟姊妹。例如秦時有祖輩的大篆，有子輩的小篆，有孫輩的隸書。而其他五體，各有所近，又是各輩的兄弟姊妹。」《古代字體論稿》，《啟功全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卷，頁69。

《急就》一篇。漢成帝時黃門令（Chief of the Palace Eunuchs）史游作。

《元尚》一篇。漢成帝時將作大匠（Chief Architect）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注：後四種書是注釋書，其它為小學材料。）

小學書一共有十位作者，四十五篇。增入揚雄、杜林兩作家，三篇。

（注：這句是班固原注。它表明在各篇目錄中，他自己補充了兩家，三篇，這是劉歆書中所無的。由此可知，其它部分都是劉歆編纂而為班固所完全採用的。）

《易》說：「上古時代（統治者）通過結繩（knotted strings）來治理事務，後世聖人替換為文字，百官受到管理，萬物變得明晰，這是得益於夬卦的啟發。」（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三卦）（注：以上引自《易傳·繫辭下》，下一句引自《易經》）「夬，在王的朝廷傳播，」指文字在王的朝廷傳揚散佈，其（文字的）作用非常巨大。古時候（男孩）八歲進入小學，所以《周官·保氏》說，（保氏的）職責是教授貴族子弟六書，指：

- （1）象形（模仿物象）
- （2）象事（模仿事務）
- （3）象意（模仿理念）
- （4）象聲（模仿聲音）
- （5）轉注（「轉動傾注」）
- （6）假借（借貸）

這是創造文字的基本方法。

漢初蕭何（注：據《漢書·刑法志》：「蕭何收集秦朝法律，選取適合當時需要的，作法律九章。」有可能考試制度也是從一部分秦法演變來，由蕭何採納的。）制定一條法令，說：「太史來考驗學童，（確定他們是否）能背誦和書寫九千字以上，（如果可以，他們）才可以作書記員。又

用六種書體考驗他們，成績最佳者將選拔去尚書部門或御史部門作秘書。（如果）官吏和百姓的上書，文字書寫不正確，他們就會遭到彈劾。」

這六種書體是：（1）古文（古體）、（2）奇字（古體中的罕見字）、（3）篆書、（4）隸書（下層官吏體）、（5）繆篆（摹刻在印章上的書體）、（6）蟲書，這些字體可以用來全面理解古今文字，用來書寫印章、旗幟和證件。

古代的法令稱，必須使用正體字（regulation script）書寫，如果不知道怎麼寫，就先放一邊，求教長輩們。到了衰世，沒有是非準則，人們遵從自己的私見。所以孔子曰：「我還有機會接觸到史書的殘文³⁰。現在這種情況消失了！」（《論語·衛靈公》）這是為（文字）逐漸失去規範而痛心。

《史籀篇》是周朝的史官用來教育學童的書，其字體與孔子壁中書的古文不同。《蒼頡》七章是秦丞相李斯所作；《爰歷》六章是車府令趙高所作；《博學》七章是太史令胡毋敬所作：（這三種書中的）文字多採自《史籀篇》，但篆體差別很大，即所謂的「秦篆」。這時候隸書產生了，這是由於行政和法律事務（officers' affairs and legal matters）極大的增多，（因此字的筆畫）趨於簡化和方便。隸書應用於囚犯事務。

漢初，平民的教師把《蒼頡》、《爰歷》、《博學》合併為一，每六十字以為一章，共五十五章，稱為《蒼頡篇》。（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沒有重複的文字。（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漢）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這兩種書只使用了《蒼頡篇》中的文字，（注：原文作「正字」或許可以翻譯為「初文」[the original characters]，即在文字初創時賦予該字的朔誼[the original meaning]。而不是指「假借字」³¹，考古發現的竹簡和帛上存在這類例子。）而《凡將篇》則使用了一些別的文字。元始年間，（皇帝）命令精通小學的學者，有一百多人，來宮廷中記錄文字。揚雄採用了其中最有用的文字來作《訓纂篇》，以續《蒼頡》，又改易了《蒼頡篇》中重複的文字。共成八十九章。我（班固）又接著揚雄作了十三章，共達一百〇二章，沒有重複的文字，六藝群書所記載的文字幾乎都在這兒了。

³⁰ 譯者注：「史之闕文」，陳夢家譯為「fragments of history」，今按，當指史書闕而不書的情況。

³¹ 譯者注：假借字，英文頁279原作「substitute（替代）」，結合第四節「《說文》及其先驅」I說考古發現的漢代《蒼頡篇》有假借字（phonetic loans），則此「substitute」當指假借字，跟上一句中的正字、初文相對照。

《蒼頡》有許多古字，（但）平民教師不知其讀音，（漢）宣帝時，有一個齊人能正確發音（pronounce correctly），徵召他（來到朝廷），張敞跟從他學習，（張敞）傳到外孫的兒子杜林，杜林給《蒼頡篇》寫了一篇注釋，已著錄（於此書目中）了。

這篇譯文至為重要，涉及諸多問題和事實。總結如下：第一，書目；第二，對六書的解讀；第三，漢代教育考試制度；第四，字體的演變；第五，漢代的重要字書。這裡打算討論一個問題；在班固小序和許慎《說文·敘》中出現的「六體」和「八體」的關係問題。其他的問題將在後文提到的時候再討論。

有必要指出，「古文」這個術語有不同的涵義。（一）古文的本義是「古體」。（二）古文指在孔壁中發現用「古體」寫的特定書籍。（三）古文是研究這些書籍的學派名稱。這個順序不僅表示不同用法中的涵義，而且表示了學者使用這一術語在時代上的順序。

《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文心雕龍·練字篇》都說，「在漢代，六體用於教學和考試。」³²然而，《漢書·藝文志》和《文心雕龍》都提到這是漢初的法律規定。班固在《藝文志》小序中，首先表述了這條法律，緊接著就列舉了六體的名稱，其中就包括「古文」。但據許慎《說文·敘》，古文並不在秦書「八體」之中，「八體」是西漢考試的基礎內容，古文是王莽時期「六書」（Six Scripts）之一；然而班固小序把「古文」作為漢初考試系統的「六體」內容之一。這個問題可以從如下三方面考慮：

（一）如果承認許慎說法正確，則班固必誤，且在事實上作出如下結論：古文是在劉歆的支持下獲得地位的。因此似乎班固採納了劉歆的學說，並寫進了目錄中，但卻把流行在王莽時期的體系說成好像是漢初的。在這一點上，許慎糾正了班固的錯誤，他寫漢初用「八體」，王莽時用「六書」。我們認為許慎的表述是正確的。

（二）如果我們接受班固的觀點，則許慎必誤，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古文業已存在，且是漢初考試制度的一部分。我們認為，這僅僅是古文派信徒對古文經權威性的訴求。

（三）王先謙在他的《漢書補注》中，企圖調和這種分歧，認為班固寫

³² 譯者注：《漢書》：「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頁1721。《隋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946。《文心雕龍·練字》「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54。

「六體」的那段，他的本義是想寫「八體」，這樣才使這段話能跟已知的漢初情況相符合。王氏進一步指出，班固在下一段所寫的「六體」，是正確的，但這裡指的是王莽時期的。然而，沒有理由懷疑文本的原文寫錯了。第一，沒有合理的證據能說明「六體」應作「八體」；第二，兩個句子連續使用了「六體」；第三，完全沒有文本上的證據能證明，班固寫的第二個「六體」指的是王莽時期的。³³

許慎在撰寫《說文》時，能夠讀到班固《漢書·藝文志》的目錄和小序（小序概要地敘述了文字、字體的歷史）。許慎也有可能讀到劉歆的著作。他從這些材料中採納了許多內容，但在認為必要的地方加以補充和修正。因為班固和許慎的材料對研究中國古文字學是最重要的，他們之間的不同，需要進行細緻地研究。下面是許慎《說文解字·敘》的譯文³⁴：

伏羲統治天下的上古時代，他向上觀察天空的現象（phenomena），向下觀察大地上的形象（forms），（他）看到鳥類和動物的花紋與土地所適宜的東西，他從近處的人身上選取形象，又從遠處的物體上選取形象；於是（他）創作《易經》的八卦（Changes' Eight Trigrams），作為現實世界的象徵。到了神農氏，通過結繩的方式處理事務。後來事務變得

³³ 譯者注：《漢志》「又以六體試之」。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李賡芸說，《說文·敘》為八體，「此『六』乃『八』之誤。」王先謙補充說「上文明言八體，是班氏非不知有八體者，且此數語與《說文序》脗合，不應事實歧異，淺人見下六體字而妄改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948。按王先謙所謂「上文明言八體」是指《八體六技》。張政娘則認為《說文·敘》作八體為誤：「《說文·序》乃作八體，此則由於許氏之妄改。……蓋許氏以為六體乃亡新時所立，漢初蕭何草律當沿秦八體耳。然則，今考《尉律》原文，當以『六體』二字為近古也。」（《說文序》引《尉律》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頁131-132。所謂「妄改」，都是校書者臆定之辭，殊無根據。陳夢家的觀點與楊樹達相似，《漢書管窺》：「姚振宗云：班書皆據《別錄》《七略》，此文先言六體課試，次言六體之目，文一氣貫注，斷不致誤。諸家以《說文·敘》謂新莽時有六體，竊謂莽之前已有六體，故劉光祿父子得以著於《錄》《略》。若事在新莽之時始有，則《錄》、《略》不及著錄，此尤顯而易見者。《文心雕龍·練字篇》、《隋書·經籍志》並作六體，與《漢志》相同，證據確鑿，李賡芸說六體為八體之說不足信明矣。」《楊樹達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22。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呂后二年，西元前186年）：「〔試〕史學童以十五篇，能風（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有（又）以八體（體）試之，郡移其八體（體）課大史，大史誦課，取取（最）一人以為縣令史，殿者勿以為史。」證明《說文·敘》作「八體」為是。關於為何班書作「六體」，李學勤說：「《漢志》的『六』字顯然有誤，很可能恰是由於下文有『六體』所致，李賡芸說還是正確的。」（《試說張家山簡〈史律〉》，《文物》2002年第4期，頁71）。

不過，正如陳夢家、楊樹達所說，從文例來看，沒有理由懷疑「六體」是訛誤，只能從為何班固要寫作「六體」著眼。「六體」之目，淵源本自劉向《別錄》，劉歆在王莽時期當有推動古文地位的作用，也就是陳夢家說的，「古文是在劉歆的支持下獲得地位的」、「這僅僅是古文派信徒對古文經權威性的訴求」，這樣的闡發似更為深刻。李零說：「班固不講秦書八體，只講甄豐六體，並以甄豐六體直接取代秦書八體，這不是錯字，而是竄改。」《蘭臺萬卷》，頁65。

³⁴ 譯者注：許慎《說文解字·敘》（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314-316。這裡不再附注原文。

更為複雜，出現大量欺詐行為。黃帝的史官蒼頡，看到鳥獸的足跡，知道通過這些標記（彼此之間）可以相互區別，首先創造了文字（原文「書契」指「文字和符券」）。百官受到管理，萬物變得明晰，這是得益於夬卦的啟發。（注：從開頭到這兒，引自《易傳·繫辭下》，下面一句引自《易經》。許慎對以上引文作了若干修改，後面我們還會討論這個問題³⁵。）「夬，在王的朝廷傳播」，是指「文化（注：「文」指「（事物的）特徵」，擴大引申為「文化，文明，文雅，紋飾」。文的本義是「表面的彩色」。這僅用為字面義），在王的朝廷散佈光大」，君子由此獲得俸祿，但有文化而無品德則是忌諱的。

蒼頡通過摹仿每一類事物的形象而創造的文字，稱為文。後來圖象（picture）和聲音（phonetic）相結合，稱為字。（注：段玉裁據《左傳·宣公十五年》孔穎達《正義》引文，補足了今本所無「文者物象之本」六字，謂「文是事物的原本形象」。）字指「增加」、「變多」。記錄於竹帛上稱為「書」。書是如（注：「如」和「書」疊韻；所謂聲訓）的意思。到了五帝三王的時代，字體演變為不同的形體，七十二位王去泰山祭祀，（所留下的石刻，字體）沒有相同的。

《周禮》說：「八歲時進入小學，保氏先用六書教育貴族子弟：」

- （1）指事（indicative of affairs）。指事是看到（字）就能夠知道（它）；觀察和辨認出它的意義，（注：末兩字，宋本作「可見」，我們採用段玉裁的修正，據《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文改為「見意」。）例如上、下。
- （2）象形（imitation of pictures）。象形是根據事物的形狀和曲綫，完整地畫出來。例如日、月。
- （3）形聲（form and sound in compound）。形聲是用事（affair）來作為字（的一部分），再添加一個相似的聲音，例如江、河。
- （4）會意（assembly of ideas）。會意是把構字單位（units）排比在一起，意義相結合，使指向的意義得以顯現，例如武、信。
- （5）轉注（the turning and pouring）。轉注是由相同部首（classifier）建構的字，因此把相似的意義相互傳遞，例如考、老。

³⁵ 譯者注：相關討論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漢字字形的由來》」。

(6) 假借 (borrowing and lending)。假借是本來沒有其書寫形式 (written form)，用已有音近字來托出 (carry out) 其事，例如令、長。

到了(周)宣王的時代，太史編寫 (compiled) (注：班固忠實地採用劉歆的原文，使用的是「作」字，見前輯佚引文及班志。然而，許慎改變了班固和劉歆的文本，「籀箸」的意思是「編寫」[to compile and to write])。許慎之後的學者，在近一千八百年間，無不錯誤地認為「籀」是太史的名字。只有將不同的文本和引文進行細緻嚴格地比勘，才能揭示這類差異)³⁶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很不同。孔子書寫六經 (Six Classics)，左丘明作《春秋傳》，都用古文，他們(使用「古文」)的原因可以說明。後來諸侯取得權力，不受王的控制。他們厭惡禮樂對自己的阻礙，都清除了他們的典籍。分裂為七國，田畝長寬不同，道路車軌不同，法律條文不同，衣冠風格不同，語言口音不同，文字形體不同。秦始皇帝首次統一了帝國，丞相李斯上書(使所有的文字)統一，廢除與秦字體不同的字體 (scripts)。李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大都取材於《史籀篇》的「大篆」，但大為修改和簡化，成為所謂的「小篆」。這時，秦燒掉經書，清除舊有的記載。派遣大量的囚犯和軍隊，去駐防和勞役。(所以)官員與法官的職務極大的增加，因此開始使用隸書，使(文字)簡單方便，從此古文就被拋棄了。此後秦國文字有八種書體 (types)：

- (1) 大篆 (Great Seal)
- (2) 小篆 (Small Seal)
- (3) 刻符 (Script on credentials)
- (4) 蟲書 (『Reptile』 script)
- (5) 摹印 (Script on seals)

³⁶ 譯者注：陳夢家把「籀箸」連讀，訓為編寫。「甲編本」頁149稱「我們以為，籀的第一個本義是寫，由此義引申為著作綴集和誦讀。」此說是承王國維認為「籀」是讀書，不是人名的說法而來。《史籀篇疏證》，《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五卷，頁6-7。但「籀箸」連讀實不足以彌縫此說。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發現的越鼎，其銘文中有史官「史留」之名，唐蘭認為即「史籀」，李學勤從之。參看黃天樹：《說文解字通論·字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54-259。現在一般認為「史籀」實有其人。趙平安指出：「《史籀篇》的作者是周宣王時的太史，教授它的人身份是史官，它的學習對象是史學童，都已折射出它作為史所必須掌握的專業知識的性質。」〈新出《史律》與《史籀篇》的性質〉，《華學》第8輯(2006年)，頁187。

- (6) 署書 (Script for titles of books or signs)
- (7) 殳書 (Script on staves and handles of weapons)
- (8) 隸書 (the low officials' script)

漢初的時候，開始使用草書 (manuscript-style)。

成文法 (注：尉律，不在九章律中，已佚，只能從《說文》和《漢書·昭帝紀》注的引文中瞭解到。從後者可知，尉律是一種軍事法律。) ³⁷ 規定「十七歲以上的學僮，開始參加考試，能夠背誦、閱讀、書寫九千字，才可以作書記員。接著用八種字體來考他們。然後他們由郡移送至 (帝國政府的) 太史令處，一起考試。成績最好的，被任命為尚書部門的秘書。書寫如果不正確，就會遭到彈劾。」現在雖有成文法，但不再舉辦考試和培養小學學問了，其理論已經長久得不到全面的理解。(注：「小學」一詞發展為三種意義：(一) 用為「初級學校」，一種學制。(二) 初級學校中的主要課程，文字的閱讀和書寫。所以字書稱為「小學」。班固把這個詞當作六藝類的子目，六藝分為九個子目，如《易經》《尚書》《論語》《孝經》等，小學是這九類的最後一種。(三) 許慎首次把這個詞用作研究文字的學問。小學研究分三類：(a) 古文字學的 [palaeographic]，(b) 語音學的 [phonetic]，(c) 語義學的 [semantic]。承載了如此複雜含義的「小學」一詞，可以直譯為「古文字學研究」[palaeographic studies]。許慎之後，這個詞除了用於劃分學制外，總是指「古文字學」[palaeography]。直到現在，劃分學制仍使用「大學」和「小學」的稱呼。)

孝宣皇帝時，徵召能夠讀《蒼頡篇》的人到朝廷，張敞跟從其學習。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 (注：職官名「講學大夫」，可能指「教學官員的主管」[The Chief of the Teaching Officials]，這是王莽

³⁷ 譯者注：陳夢家認為「尉律」是漢律篇名，又據《漢書·昭帝紀》「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注：「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漢書》，頁229-230) 說「尉律」跟軍事相關。張政烺〈《說文序》引《尉律》解〉認為《尉律》「九千字」原作「九章」，「六體」原作「六曹」，「劉歆乃不惜詭更正文，以遂己志，舉九章六曹皆成寫字之道。」頁135。這種臆解，並無事實依據。今按，《說文·敘》所引漢律內容，見後來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名為《史律》，李學勤指出《說文》「尉律」乃係泛稱。(〈試說張家山簡《史律》〉，頁69。) 但《說文·敘》所引「尉律」並非王應麟所說的「廷尉治獄之律」。兔子山漢簡把「史律」歸為「旁律」類，與「獄律」相區別，張忠煒、張春龍指出旁律是行政、制度、禮制性的法律。(〈漢律體系新論——以益陽兔子山遺址所出漢律律名木牘為中心〉，《歷史研究》2020年第6期，頁22。)「史律」明顯為行政法律，規定了史學童等的學習、考試、任用制度。

時期的新官職。) 秦近也能理解(《蒼頡篇》)。孝平皇帝時，徵召爰禮等一百多人，命他們解釋(和記錄)文字(注：《漢書·平帝紀》補充說，在元始五年〔西元5年〕，使那些知道逸經〔lost Classics〕、古記〔old records〕、天文、曆算、小學、《史篇》、方術〔strategems〕、《本草》及以教授《五經》、《論語》、《孝經》、《爾雅》的人，都徵召到京師。至者數千人。³⁸《王莽傳》作「元始四年」〔西元4年〕，命令上述諸人及熟悉小學和《史篇》文字的人，來在朝廷記錄和解釋文字，糾正錯誤，統一異見。³⁹應注意，此處「小學」和《史篇》是分開提的，我們後面將論及，《史篇》指「秘書的書」〔the secretary book〕，是漢代小學字書的代稱。《漢書·藝文志》用「小學」作字書目錄的總名，但上面《漢書》的引文中，似乎「小學」和《史篇》之間應稍有區別，因此才會被分別提及。廣義上，小學包括漢代的字書，但不僅僅是字書。比如，《四民月令》說，「冬天兒童學習篇章和小學」；《論衡·別通篇》說「在《蒼頡》的篇章和小學的書中，文字都具備了。」⁴⁰由此可知《史篇》和篇章僅指字書。小學指字書和其他跟研究文字相關的書，例如前面列舉的字書訓故。因此如果小學跟《史篇》分別列出來，這意味著除了嚴格意義上的字書之外，字書訓故類書也跟小學相聯繫。) 未央廷中，爰禮被任命為小學第一學士。黃門侍郎揚雄，采用這些文字編纂了《訓纂篇》。加上《蒼頡》共得十四篇，總計五千三百四十字，所有書籍中的文字，幾乎都具備了。

亡新(王莽的朝代)攝政時期，使大司空甄豐(注：《王莽傳》，在居攝元年〔西元6年〕，甄豐任命為大司空。我們認為甄豐大概在這時或緊接著的幾年，重新調整了「六書」(Six Script)系統。正如前述，「古文」成為考試制度的一部分當在此時，而不是如班固提到的那樣在漢初。當然，這不能排除「古文」作為一種字體在此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只是說「古文」在考試制度中的地位，是新莽時期法律規定的。) 等人

³⁸ 譯者注：《漢書》卷十二〈平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頁359。

³⁹ 譯者注：《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上〉：「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頁4069。按《莽傳》未提及「小學」，應該是《平帝紀》分別提及。

⁴⁰ 譯者注：《論衡·別通》「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論衡校釋》，頁705。

去校定文書 (written materials)。(王莽) 自認為創造制度，大大地改變和修正「古文」。當時有六種書體 (types) 的文字：

- (1) 古文 (old-script)，出自孔子壁中書。
- (2) 奇字 (rare characters)，古文中的異體字。
- (3) 篆書 (注：「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 (小篆) 也」) 早先注釋的十三個字竄入此處；段玉裁說，此句誤植，應在下一類之末。如果這幾個字保留在 (3) 之後，或放在 (4) 之後，那麼許慎寫的句型的平衡就被打破了⁴¹，因而這十三個字至少值得懷疑。而且，已知最早引用此文的兩處傳記：

A 《晉書·衛恆傳》，頁1183欄2。

B 另一傳記出現在兩部史書裡：《北史·江式傳》，頁2859欄2，《魏書·江式傳》，頁2097欄3，《二十五史》版)⁴²

其引文中都沒有這十三個字。《衛恆傳》裡的《四體書勢》引用許慎《說文·敘》關於王莽六書的論述，沒有這十三個字，也沒提到許慎的名字。這些引文和《說文·敘》的一致性，足以證明極有可能此為後人竄入。衛恆的文中提到秦代歷史時，有兩條引文來源不明：(a)「或曰：『程邈下杜人，秦始皇帝獄吏，發明篆書。』」(b)「或曰：『程邈創造的字體是隸書。』」⁴³

《漢書·藝文志》〔唐〕顏師古 (西元581-645年) 注，引許慎前三種字體，後插入衛恆的引文，省略了「或曰」二字。⁴⁴

兩種《江式傳》都引了江式的《古今文字表》，文中表述了跟衛恆非常相似的話，然而省略了第二條不明來源的說法。⁴⁵在引用

⁴¹ 譯者注：所謂「句型」，蓋指六體後面接的注釋，多是四、五、六字，只有本句是十三字。

⁴² 譯者注：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上海：開明書店，1935年)。

⁴³ 譯者注：《晉書》卷三十六〈衛恆傳〉：「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破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062-1063。

⁴⁴ 譯者注：《漢書·藝文志》「六體」顏師古注云：「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頁1722。

⁴⁵ 譯者注：陳夢家說「omitting, however, the second unknown source」，實則《江式傳》省略的是第一條程邈作大篆的說法，保留的是第二條程邈作隸書的說法，參下注，這裡的表述顛倒了。

第一條時，江式省略了「或曰」字樣。衛恆把他的兩條材料用「或曰」的形式，放在許慎的文字後，因為隸書是大家所熟知，衛恆用「或曰」表示「未詳」，足以與許慎的原文區別開。然而，當江式引用衛恆的說法時，省略了「或曰」，使其與許慎的表述相並列，讓這句話看起來像是許書原本所有。⁴⁶我們認為這是宋及以後版本竄入的一句話。

需要指出，漢以後書法家的習慣是非常任意地把某種字體的創造歸功於早期學者。正如宋代版本中表述的，程邈是小篆的發明者，後來的版本皆同，這跟許慎同時代的蔡邕的證據相矛盾。蔡邕列程邈為隸書發明者，這跟衛恆引用的第二條來源不明的說法相一致。⁴⁷當然，衛恆能看到蔡邕佚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小篆。

(4) 佐書 (lower officials' script)，即秦隸書。

(5) 繆篆 (curved seal)，用於摹印。

(6) 鳥蟲書 (birds-and-reptiles-script)，用來書寫旗幟和證件。

壁中書 (books-from-the-wall) 是魯恭王推倒孔子的住宅而發現的《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給朝廷)。郡國也往往在山川發現鼎和(其它)容器，其銘文就是早期朝代的古文，彼此都很相似。儘管其來源不能找到了，但大概的情形還可以推知。

但是人們對此大加批判，(他們)以為是有人為了追求新奇而陰險地修改了原文 (the original text)，毫無根據的偽造來源不明的書籍，對抗傳統的做法，以此來炫耀於世。這些學者競相解釋評說經典的意義，稱「秦代的隸書就是蒼頡時候的文字」，(而且他們)說：「文字是父子相傳的，怎麼會偏離(真相)呢？」他們誇誇其談說：「馬頭和人組成長字，一個人

⁴⁶ 譯者注：《北史》卷三十四〈江式傳〉：「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及亡新居攝……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月鳥蟲，所以幡信也。」(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278-1279。《魏書》卷九十一〈江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961，文略同，不具引。

⁴⁷ 譯者注：蔡邕〈聖皇篇〉：「程邈刪古立隸文。(《書斷》上，《法書要錄》七，《墨池編》七)」《全後漢文》，頁796。

手持十就是斗字，虫字是由中字曲折而成。」廷尉（judge of the court）有時解說法律也依賴文字，（例如）「苛人可以接受錢財，因為苛（𠂔）字是由「止」和「句」組成的（意思是「阻止某人，並鉤取其錢」）。」這類例子非常多，但都不符合孔子的古文，也不符合《史籀篇》。庸俗的學者和那些鄙野之人，炫耀他們所知道的，隱藏他們的無知。既不懂得博通的學問，也不懂得文字的根本條理。對舊藝（old arts）感到陌生卻熟悉於胡言亂語，（他們）認為自己所知道的妙不可言，（他們）已經貫通聖人深邃的道理。（他們）又見到《蒼頡篇》中「幼子獲得帝王的任命」，因此說：「此（《蒼頡篇》為）古代帝王所作，它的文字中有神仙之術！」沉迷於錯誤之中卻不感悟，他們多麼得執拗悖逆！《書經》（《虞書·皋陶謨》）曰：「我想看到古人的象徵（symbols）。」這是指「我必定遵照古代文化並實踐之，不使之走樣。」孔子說（《論語·衛靈公》）：「我還有機會接觸到史書的殘文。（這些）現在都沒有了。」這是批評那些人，自己不懂卻不去詢問別人，批評他們只用自己的觀點，卻沒有是非正誤的標準，批評他們油嘴滑舌、歪理邪說，使所有學者遠離真相。文字是經（Classics）和藝（Arts）的根本，是政治的基本要素。通過文字，前人的傳統得以延續，後人得以瞭解其文化遺產。所以說：「根本建立之後，道（法則）才能產生。」（《論語·學而》）「瞭解世界究極的法則卻不去打亂它。」（《易經·繫辭傳》）

現在（我）編纂（此書），採用篆文，以及古文和籀書（大篆）；（此書）多多少少採納了博通學者的意見；值得信賴且提供證據，對其論述加以解說和評論。（本書）的目的是管理族群，糾正錯誤，啟發學者，揭示奧義。（文字）劃分井然有序，排序決不混雜。凡是可見的萬事萬物（在此書中）都有記載。若有意義模糊的，就加以解釋使之清楚。

版本是：孟氏的《易》，孔安國的《書》，毛公的《詩》，《禮》，《周官》，左氏的《春秋》，《論語》，《孝經》。以上這些書都是「古文」（即屬於古文學派）。我所不知道的，就缺而不論。

第四節 《說文》及其先驅

上面簡要地介紹了許慎以前的材料。在當時，這些書籍是學童的課本，至今仍無古文字學上的價值。前面已指出，《說文解字》是這類字書中最重要的一

部，奠定了古文字學作為傳統經學領域中一種特殊學問的基礎。⁴⁸著者許慎本身就是一位經學大師，促使他編纂這部字典的原因是，如果沒有關於古文字的用法說明，研究經書時會面臨巨大困難。許慎在《說文·敘》中稱，其書「博采通人」，表明他受惠於古文經學派的同代和前輩學者。那時，有不少學者專門研究《尚書》，由於在閱讀和解讀《尚書》文本和訓詁時存在分歧，因此需要有一本字典來指導早期的研究。

《說文》引用的桑欽、杜林、衛宏、徐巡、賈逵，都是《古文尚書》學者，以及古文學派的揚雄，古文學派的建立者和領袖劉向、劉歆等。由於使用不同來源的《尚書》作為權威版本，漢代學者分判為兩派，於是產生了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今文學派使用的是秦始皇時的博士（*Regius scholar*）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尚書》。古文學派聲稱他們的文本出自孔子壁中書，比今文經多出十六章。之所以分成兩個學派，因為：第一，以不同來源的文本作為各自的典範；第二，他們的文本是用不同字體書寫的；第三，不同的師說產生了不同的訓釋。

漢代產生的新文學體裁「賦」，這種散文詩體在細節闡述上極盡誇張、描寫的題材極為多樣。這類作品使用了大量的生僻字，這為早期字典編纂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資料來源。許慎引用的司馬相如、班固和揚雄等，在篇章的編寫上都有貢獻，而且也都是著名的辭賦家。許沖〈進《說文》表〉稱，許慎在寫完這本書之後，曾用此書教授年輕的宦官⁴⁹，因為宮中有年輕人需要這樣一本著作來研求經典。我們知道在許慎之前史游已編纂過篇章，很可能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創作辭賦的風尚，產生了對收錄大量文字的工具書的需求，而賦本身就是編纂工具書非常有用的生僻字（*uncommon characters*）來源。其次，許慎感到亟需一本書來輔助教學，但對許慎來說最重要的追求是他的著作能夠推進經學研究。許慎《說文·敘》指出「文字是經和藝的根本，是政治的基本要素。通過文字，前人的傳統得以延續，後人得以瞭解其文化遺產。」⁵⁰

《說文》是第一本可以稱為「古字典」（*old dictionary*）的著作，它在方法

⁴⁸ 譯者注：李零認為小學開始附麗於經學可以追溯到漢武帝時期，他說：「漢代的小學，武帝以前和武帝以後，恐怕有所不同。漢初，學字是為了抄文件，不是為了讀經。但武帝以來，經藝取仕的路逐漸被打通，特別是王莽之後，情況有大變化，學字開始和讀經有關。小序說：『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七略》以小學附經，就是反映這一趨勢。」《蘭臺萬卷》，頁66。

⁴⁹ 譯者注：〈進說文解字表〉：「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說文解字》，頁320。

⁵⁰ 譯者注：《說文解字·敘》：「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頁316。

和內容上跟此前的字書都有巨大的區別。下列幾點是《說文》比先前字書進步的地方：

- I 收錄字數極大增加。
- II 以五百四十部統轄九千多字。
- III 逐字分析。
- IV 逐字訓釋。
- V 注音，注出合體字的聲符。
- VI 所有可用字體都加以收錄。
- VII 文字的系統整理和呈現。

下面對這七點進行詳細論述。

I. 篇章中的句子總是寫成確定的字數且沒有注釋。前面已經指出，在漢代《蒼頡》、《爰歷》、《博學》合併為一篇，也叫做《蒼頡篇》。一共有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總字數達到三千三百字。從現存漢代殘卷可知，《蒼頡篇》為四字一句，押韻，有假借字（phonetic loans）。試圖把文字分為不同的詞族（word-groups），如顏色詞、動物詞、計量詞之類，都被恰當地類聚在一起。由殘卷可知，漢代塾師給《蒼頡篇》增加了新的章節，因為書中引用了漢代的故事就是明證。正因為有所增益，所以可以合理地猜想，秦代《蒼頡》、《爰歷》、《博學》三篇的字數要比漢代《蒼頡篇》的三千三百字少。

根據《漢書·藝文志》，司馬相如的《凡將篇》不含重複的字，且使用了《蒼頡篇》以外的字。從殘卷可知，《凡將篇》通常是七字一句，而且極有可能是押韻的。詞族分類也與《蒼頡篇》相似。

顏師古《急就篇注·敘》說，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極為景慕，於是摹仿其書而擴充之。⁵¹《急就篇》尚存，有三十一章，每章六十三字，少有複字，總共一六一八字。因此《凡將篇》的總字數一定少於此數。《急就篇》的句式有三種：第一種是七字句，第七字押韻；第二種是兩個三字句，第六個字押韻；第三種是兩個四字句，第八個字押韻。《急就篇》的三十一章⁵²內容可分為：一至六章為姓氏人名；七至二十四章為品物；二十五至三十章為職官名；

⁵¹ 譯者注：《急就篇注·敘》：「逮至炎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倖效書寫，多所載述，務適時要。史游景慕，擬而廣之。」

⁵² 譯者注：頁302原作「八章」，今正。

三十一章結語為漢朝頌詩。⁵³《急就篇》採用了《蒼頡篇》中的文字編寫而成，且兩書功用相同，可以猜想《蒼頡篇》當與《急就篇》非常相似，因為從秦代直到漢平帝召開會議，都使用常用字編寫篇章。⁵⁴

東漢前夕，揚雄在篇章中增加了經典中的文字，因此使得篇章不像是給學校使用的課本而更像是給准文人（would-be literati）的分類詞典（thesaurus）。揚雄的《訓纂篇》有三十四章，二〇四〇字，加上《蒼頡》的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總共有八十九章，五三四〇字。班固又增加了十三章，七八〇字，使篇章總數達到一〇二章，六一二〇字。班固的十三章很可能就是《隋書·經籍志》中的《在昔篇》和《太甲篇》。「在昔」的意思是「在古時候」。給書命名的方式多種多樣，漢代學者喜歡用正文前兩個字作為書名。篇章命名尤其如此。篇題暗示，其內容是有關歷史的。太甲是一位商代的王。兩篇的命名方式是同樣的。根據篇題推測，這兩個篇章收錄了一些經典中的文字。

東漢和帝（西元89-105年）時，賈鮪作《滂喜篇》。關於《滂喜篇》的記載見下：

（一）南朝梁庾元威《論書》說，「李斯改大篆為小篆，作《蒼頡》九篇。趙高作《爰歷》六篇。胡毋敬作《博學》七篇。後人分為五十五篇；這是《三蒼》的第一部分。漢哀帝元嘉時（應該是元壽，西元前2年至西元1年）揚子雲（即揚雄）作《訓纂》，以『滂喜』二字結尾，這是《三蒼》的第二部分。漢和帝永元時（西元89-105年）賈升郎（即賈鮪）續寫（從揚雄的『滂喜』）至『彥均』（該篇的末兩字），這是《三蒼》的第三部分。」⁵⁵

（二）唐代學者張懷瓘的《書斷》記載，「揚雄作《訓纂篇》二十四章（應為三十四章），來續《蒼頡篇》。孟堅（即班固）之後續作十三章。漢和帝永元時，賈鮪又有續寫，擴充班固的篇章至三十四章，以《訓纂篇》的最後兩字為篇題，因此叫《滂喜篇》，意為『滂沱大雨』『盛大豐富』。共計一二三章；所有文字收錄在內」和帝時，賈鮪編《滂喜篇》，以《蒼頡》為第一部分，《訓纂》

⁵³ 譯者注：參張傳官：《急就篇新證·緒論》（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

⁵⁴ 譯者注：周飛、時遂營認為《蒼頡篇》的性質是統一文字所用的文字彙編，主要用來學習小篆字樣，不是用來閱讀的。史游對《蒼頡篇》的文字做了重新編排，「一方面保留《蒼頡篇》中不少意思較為連貫的文字組合，另一方面對《蒼頡篇》中較為散亂的文字按照意義重新排列組合。……《急就篇》的內容更加貼近日常生活，且貫徹以類相聚的原則，使其較《蒼頡篇》更加適合作為識字課本。」《《蒼頡篇》與《急就篇》關係初探》，《出土文獻》第12輯（2018年），頁257-271。

⁵⁵ 譯者注：庾元威《論書》：「及秦相李斯，破大篆為小篆，造《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造《爰歷》六章，太史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三倉》上卷。至哀帝元嘉中，揚子雲作《訓纂》記『滂喜』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升郎更續記『彥均』為下卷。皆是記字，字出衙人，故人稱為《三倉》也。」《全梁文》，頁752。

為第二部分，《滂喜》為第三部分，構成了所謂的《三蒼》。全用隸書書寫，此後隸書更為流行。」⁵⁶

因此《滂喜篇》跟《蒼頡篇》《訓纂篇》合併成所謂《三蒼》；「蒼」是「蒼頡」的縮寫，因為這部彙編包含了《蒼頡篇》的三種書。《滂喜》有三十四章，二〇四〇字。

《三蒼》分為三部分：

一、產生於漢代的《蒼頡篇》，九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

二、揚雄的《訓纂篇》，五篇，三十四章，二〇四〇字。

三、賈魴的《滂喜篇》，篇數未知，三十四章，二〇四〇字。⁵⁷

庾元威《論書》稱「漢晉史書及古今字書都說『《蒼頡》九篇為李斯作。』」庾元威時的《蒼頡篇》，文中引用漢初史事，因此他認為整本書都不是原始的秦代文本。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根據同樣的理由，斷定《蒼頡篇》非秦本之舊，而是有漢人的增添。⁵⁸我們認為，由於增添的內容僅限於漢初史事，因此合編本的《蒼頡篇》當產生於漢初。

漢代《蒼頡篇》加上增添的部分，共九篇。《說文·敘》稱，《蒼頡篇》和《訓纂篇》共十四篇，所以《訓纂篇》一定是五篇。段玉裁說《凡將》《急就》和《元尚》包含在這十四篇內，但據《漢書·藝文志》稱，這三種篇章「只是用了《蒼頡篇》中的文字，而《凡將》還使用了一些其他的字……《訓纂篇》續寫《蒼頡篇》時，改掉了《蒼頡篇》中重複的字。」⁵⁹由此可知，《急就》《元尚》不包含在《訓纂》與《蒼頡》合併的十四篇裡。又因為《蒼頡》九篇、《訓纂》五篇及與《滂喜》合併為的《三蒼》，在《江式傳》中，《三蒼》和

⁵⁶ 譯者注：張懷瓘《書斷》：「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為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盛大。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唐〕張彥遠輯錄《法書要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01-202。「至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蒼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喜》為下篇，所謂《三蒼》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法書要錄》，頁166。

⁵⁷ 譯者注：「三」這段文字，原在下頁「綜上」前，頁306。現上移至「一」、「二」後，使相附近。

⁵⁸ 譯者注：庾元威《論書》：「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倉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孫信京劉等，郭云：『孫、信是陳孫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識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牛頭馬腹，先達何以安之？」《全梁文》，頁752。顏之推：「《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孫鯨韓覆，畔討滅殘』……皆由後人所屬，非本文也。」《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583。

⁵⁹ 譯者注：《漢書·藝文志》：「……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揚雄）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頁1721。

《凡將》分別列為兩種書，說明《凡將》也不包含在《訓纂》裡。

綜上，《三蒼》共計一二三章，七三八〇字。⁶⁰（注：〔唐〕封演《封氏聞見記·文字篇》說，東漢和帝時，文字的總數達到七三八四字；比上述多出四字。這是因為《三蒼》第二和第三部分的開頭的兩字重複了前一章的後兩字。據《漢書·藝文志》韋昭注：「後人無法區分出班固的十三章，他（韋昭）懷疑是在《蒼頡》第三部分的三十四章中。」⁶¹班固的十三章，即前面說到的《在昔》《太甲》，有可能包含在賈鮪的《滂喜》裡。果真如此，賈鮪書的三分之一實際上是班固的書。我們應當時刻牢記，這些書是後續的編者充分利用同時代和早些的字書彙編而成。因此《三蒼》是一種集成性的著作，其中最早的部分溯源到秦代，之後逐漸增加。後世「三蒼」一詞的用法就等同於「字書」。)

許慎是賈鮪的同時人，賈鮪《滂喜篇》作於漢和帝永元年間。根據《說文·後敘》（注：一般認為《說文》的〈前敘〉是許慎所作。〈後敘〉放在五百四十部首表之後，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篇、部首、字頭、重文，及全書解說用字的數目。緊接著是韻文部分，用一定篇幅解釋此書創作的體例，結尾是對其顯赫祖先的贊歌。不過這種風格跟許慎〈前敘〉的風格迥然不同。〈後敘〉的第二部分是許沖將此書進獻給漢安帝時所寫的表，結尾是皇帝的批示。）許慎創作《說文》在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其子許沖將此書進獻給皇帝在建光元年（西元121年）。《說文》所收字數超過了《三蒼》；今本的字數跟許慎在敘中說的九三五三字不符。顯然後來有許多補充。

II.《急就篇》第一章寫到「『急就』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奇觚。上面羅列著名字、品物和人物。這些內容分組有序，毫無混雜。」⁶²前面已指出，《急就》的分類跟《凡將》和漢《蒼頡》是一樣的。這三種書中的文字是按詞族分類（word-group classification）的方式排列，在意思上密切相關的字，一般會包含相同的結構單位（structural unit）。即是說，跟馬車相關的字，可能會把「車」作為部件（part），跟各種魚類相關的字，可能會把「魚」作為部件，等等。但是這個結構事實（structural fact）並不是分類的基礎。許慎在撰寫《說文》時，他專門列出具有相同結構部件（structural parts）的字。《說文·敘》中，許慎使用了跟上引《急就篇》後一句完全一樣的話。「分別部居」（orderly groups）這一短語在《急就篇》中的意思已如上面所說，而許慎的用義，則指的是結構意

⁶⁰ 譯者注：李零估計《三蒼》的字數也是七三八〇字左右。〈《蒼頡》文本考〉，《蘭臺萬卷》，頁69-71。

⁶¹ 譯者注：韋昭注：「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漢書》，頁1723。

⁶² 譯者注：《急就篇》：「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頁1。

義 (structural sense) 上的「部首」(classifiers)。在許慎的系統中，確立了五百四十個這種結構部件，作為全書的部首，以結構分類法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 來安排文字。在這個系統中，所有由「馬」構成的文字，匯聚在「馬」這一部首下，因此許慎寫作「凡是屬於馬（這個部首）的，都列舉在馬字下。」⁶³然而，從有些材料來看，這種結構分類法似乎已有先行者了。《隋書·經籍志》著錄了一本賈魴的《字屬》（文字的歸屬——部首），可以從書名中冒險地推測，這本書可能跟許慎所採取的分類系統很相似。與許慎同時或稍早，學者已經使用特定的術語來指稱某個字的部件；「頭」用來指字上面的部件，「旁」用來指字旁邊的部件。⁶⁴在《說文》的結構分類系統中，任何部首下的文字，又像《凡將》和《蒼頡》那樣進一步按照詞族來排列。

III. 成書於西元前三世紀的《左傳》，是已知最早有關於試圖分析文字的著作；《左傳》中提供的三個例子，分別在宣公十二年、宣公十五年、昭公元年。《說文》採納了這所有三條例子。《左傳》之後，《韓非子》和《淮南子》偶或有分析文字的例子。緯書，即所謂漢代偽造的經典 (false classics)，運用錯誤的文字分析，來論證和解說其理論。許慎在敘中攻擊這個學派，稱其擁護者為「俗儒」(vulgar scholars)，批評他們「既不懂得博通的學問，也不懂得文字的根本條理。」劉歆批評當時學者，「分析文字，枝節細碎。」⁶⁵班固也說，「奇說詭辯，破壞了文字的結構。」⁶⁶儘管劉歆和班固沒有提及姓名，他們攻擊的對象極有可能是緯書學者。平心而論，儘管緯書學者是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分析文字，但只要他們試圖分析文字，在古文字學史上就有一定的價值。許慎用更客觀的觀點來分析，避免了緯書學派的混淆和偏見，最終建立了結構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 的原則。分析任何文字，就是把字分成單位 (units) 和部件 (parts)，並確定造字時這些單位和部件之間相互關係和結合方式。許慎書中對文字的分析，產生了兩個結果：（一）從分析的九千多各式各樣的文字中，確

⁶³ 譯者注：張傳官：《急就篇新證》第一章〈急就篇的體例與分章〉說法與陳夢家相似，頁15-16。

⁶⁴ 譯者注：此部分內容原在「重訂本」頁224講「形訓」一段，而英文本的「形訓」缺此內容，現錄於下：當時有「字頭」、「偏旁」之說，如緯書《春秋考異郵》「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為馬頭」，《說文解字·敘》引「馬頭人為長」，是以王為馬頭，長為馬頭。《說文》於𠂔下云：「𠂔頭與它頭同。」《論衡·奇怪篇》：「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為『其』下『土』，乃為『女』旁『姬』。」又《別通篇》：「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柁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木』旁『多』文字尚不能知。」《周禮·考工記》鮑人之事「察其線」注云：「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為糸旁泉。」

⁶⁵ 譯者注：《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頁1970。

⁶⁶ 譯者注：《漢書·藝文志》：「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頁1723。

定了五百四十個部首，(二)將全書分為六類(six classes)，即「六書」。⁶⁷

IV.對漢字的訓釋有三種方式：(一)形訓(commentary by structure)，(二)聲訓(commentary by sound)，(三)義訓(commentary by meaning)。前面章節已經指出形訓就是對文字的分析。聲訓，是用另一個音義相似的字給這個字下定義，這種手段在《孟子》中已經用過。音和義的關係可以分為兩部分：1.字的義相似，音相似。2.字的義相似，音不同。不同文字表示同一對象，但讀音可能不同。第一類的文字是不同時代為同一對象所造的新字，結構上不同，但讀音卻相似。第二類文字的讀音差異是由於地域變體和方言變體造成的。揚雄有一本題名為《方言》的書(「方」謂「不同的方位」，「言」謂「語言」，意思就是指「方言」[dialects])，就是論述第二類文字的問題。這是中國第一本企圖解決方言問題的著作。在揚雄以前就有人認為，文字音義上的不同，主要是由於從遠古到當代經歷了漫長的歲月造成的。然而，揚雄堅持認為文字音義的不同主要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因而是方言變體(dialect variants)。在《方言》一書中，揚雄把語言分為兩部分。其一是所有人都說的共同的語言，他稱之為「通語」、「通名」、「總語」⁶⁸，意謂「共通語」(common language)。共通語可能是在所有地方通用的，因為揚雄說共通語是「四方」⁶⁹的；此外，它可能指在特定方國使用的語言，例如齊、趙的「共通語」。其二、與第一類共通語不同的就稱為方言。揚雄名之為「諸語」(不同的語言)，或「代語」(替代的語言)⁷⁰，或「別語」(其他的語言)⁷¹，「轉語」(轉變的語言)⁷²，許慎在《說文》注文

⁶⁷ 譯者注：陳夢家可能是較早將「結構」(structure)這個概念引入到漢字的類型、性質和偏旁分析中的學者。一九三九年「甲編本」第三章《漢字的結構》，已用「結構」來指漢字的結構類型。陳夢家說：「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者是說明每一個字的形體結構的。」，頁114。唐蘭、劉大白用「構成」，來指文字的結構類型，而唐蘭書中的「結構」指文字外在的整體輪廓或筆畫的多寡。《古文字學導論》只提到兩次：「文字的結構，趨向到整齊的方面，因是在許多地方添一些筆畫，使疏密勻稱。」「象形文字注重在全體上，象某實物的形，使人一望而知，但不再筆畫的繁簡，而且也沒有固定的結構」(濟南：齊魯書社，1978年)，頁223、408。同時期的著作中，顧賓、孫東生、張世祿、齊佩、高亨、徐中舒等都用「構造」來指六書，蔣善國以「構造」、「構成」為同義詞，故兼用之。黃侃、林義光、錢玄同、楊樹達、容庚等學者沿用「六書」的名稱。其他或稱為「造字原則」、「造字條例」等。陳夢家不僅用「結構」區分漢字的類型性質，還引入了「結構單位」、「結構部件」、「結構分類法」、「結構分析法」、「結構訓釋(形訓)」等概念。

⁶⁸ 譯者注：《方言》第六「拊摸，去也。齊趙之總語也。」《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44。

⁶⁹ 譯者注：《方言》第三「庸、恣、比、佹、更、佚，代也。齊曰佚，江淮陳楚之間曰佹，餘四方之通語也。」，頁22。

⁷⁰ 譯者注：《方言》第十「𡗗、𡗗、乾、都、耆、革，老也。皆南楚江湘之間代語也。」，頁66。

⁷¹ 譯者注：《方言》第一「假、徂、懷、摧、詹、戾、𡗗，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徂。齊楚之會郊或曰懷。摧、詹、戾，楚語也。𡗗，宋語也。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頁5。

⁷² 譯者注：《方言》第十「𡗗、末、紀，緒也。南楚皆曰𡗗。或曰端，或曰紀，或曰末，皆楚轉語也。」，頁67。

中直接引用《方言》，和類似性質的補充材料。如果拿《說文》中的引文跟今本《方言》比較，就會發現《說文》僅引用了《方言》較早的那部分。這表明《方言》後面那部分可能是揚雄後學所增益的。也有可能《說文》注釋中所引不見於今本《方言》的部分，是《方言》中曾有但已散佚了的材料。

義訓最先見於《孟子》，《孟子》在有一章中引用《尚書》文句，並做了訓釋。⁷³《國語·周語下》所引《太誓故》，是《尚書》一篇的訓詁。⁷⁴《爾雅》可能編纂於秦漢時期；「爾」謂「近的，當代的，俗的」，「雅」謂「優雅的、高雅的」。短語「雅言」是指古代君子使用的高雅語言，因此「爾雅」意謂「雅俗語」，或「古今語」；即是說，用現代口語（modern colloquial）解釋古文獻的高雅的語言。許慎在《說文》訓釋中頻繁引用《爾雅》。正如我們所知，揚雄和杜林都給《蒼頡》作過注。〔唐〕玄度說：「建武時（西元25-56年），（《史籀篇》）存九篇。漢章帝時（西元76-88年），王育為之作注，但那時他已經有十分之二三不能解釋了。」⁷⁵在較早階段，篇章沒有訓詁。在許慎之前，揚雄、杜林、王育等學者都對字書作了一些訓詁。許慎在《說文》中曾引用此三人的著作。通過許書引文，可以得到下列事實：

- （一）在許慎之前已有字形分析，已使用「象形」這個術語，而且，儘管還沒提到「會意」這個術語，但文中卻按照這個概念將文字分析得非常清楚。
- （二）為了給文字注音，使用了「讀若」（pronounced as）一詞，即用更常見字來給被釋字注音。
- （三）省聲（simplified sound），是解釋 A 字如何從 B 字得聲的一種方法。比方說 A 字由 B 字得聲，但 B 字是用簡化的寫法來充當 A 字部件的。許慎把簡化前的 B 字寫出，稱 A 字是 B 字原形的省聲。這一點待後文詳論。⁷⁶

⁷³ 譯者注：陳夢家：「《孟子·梁惠王上》引《尚書》『侯我后』，解說為『奚為後我』，這是很早的傳注」《中國文字學》，頁226。

⁷⁴ 譯者注：《國語·周語下》：「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韋昭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頁48。今人標點多從「大誓」後點斷，不以「故」為書名。章太炎：「《周語》有《泰誓故》，疑伏生所述即《泰誓故》也。」《太炎先生尚書說》（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3。

⁷⁵ 譯者注：〔唐〕玄度《十體書》說《史籀篇》：「建武中，曾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宋〕朱長文纂輯：《墨池編》（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頁17。

⁷⁶ 譯者注：「英文本」後文無討論省聲者，是英文講義曾有計劃討論省聲而為成文。關於「省聲」的論述見「甲編本」第四章「第三節 形聲」，頁103-111。

除了這三位重要的訓詁家（commentators），許慎《說文》的訓釋引用了大約三十位學者的觀點，他們都在文字訓釋上做過工作。上述三點就是從這些學者的引文中得出的，下面再補充一點：

（四）形聲，這種分析類型在許慎之前就存在了。

為了便於說明許慎解說和訓釋的內容，我們將拿許慎《說文》與其前輩著作作一簡要的比較。當許慎完全採納某家的觀點時，他會引用此學者的說法，然後將學者名字放在引文之後。當許慎寫出自己的觀點後，又引用了一位或多位學者的觀點，他會在引文前先冠以學者名。下面的人名表是許書中徵引的學者，其著作所涉及的問題，即作為此條的條目：

- A 意義訓釋。
- B 結構分析：其著作偶爾指出文字屬於六書（six classes）中的哪一類。揚雄、杜林、王育、譚長、官溥、賈逵、董仲舒、爰禮、莊都、逢安、周盛、衛宏。許慎⁷⁷有時使用形聲的方法當作一種分析。
- C 讀音和聲符（phonetic-elements）
 - （a）聲符：司馬相如、賈逵。
 - （b）「讀若」：杜林、尹彤、張林、賈逵、傅毅、甯嚴、桑欽。
 - （c）省聲：杜林、京房。
 - （d）亦聲。（詳後文）
- D 方言：揚雄、賈逵。
- E 出自經籍群書中的引文。

V. 《說文》中所收的所有文字，絕大多數會有注音，但並非全部注音。合體字的語音成分往往會指出：（一）聲符；（二）省聲；（三）亦聲。（一）和（二）出自形聲字，（三）出自會意字。正如我們所知，會意字是把單位放在一起，意義相互結合，以顯示出其指向。如果其中一個單位同時用作聲符，就是所謂「亦聲」。另一注音的方式是「讀若」，可分為五種情況：1. 讀如某字；2. 讀如特定方言中某字；3. 讀如特定典籍中某字；4. 讀如特定短語中某字；

⁷⁷ 譯者注：「許慎」二字疑誤。因為此處名單是列舉許慎以前的小學家，並且形聲分析在《說文》中常見。關於上述名單可參看「重訂本」頁227-230，那裡有具體的引文例證。

5. 讀與某字同。

VI.在許慎之前，篇章從頭到尾都是由一種字體書寫的；例如《三蒼》用隸書；漢代竹簡本的《蒼頡》和《急就》，或用篆書，或用隸書，或用變化的篆書隸書（modification of the seal- and the Li-scripts）。秦時的三種篇章可能是用小篆書寫的，《史籀篇》用大篆。漢代學者讀書時，會努力找到古體（ancient script）本，以與今體（modern script）本相比較，因為那時漢以前的書籍已經全部轉寫（rewritten）成了漢代的字體。同時，漢以前的一些古體本也有所發現。《漢書·藝文志》著錄了一部《古今字》，此書可能是為了方便比較閱讀而收集的各體文字。《說文》收錄了許多古文字材料，《說文·敘》稱「現在（我）編纂（此書）採用篆文，以及古文和籀文（大篆）。」

VII.清代目錄學著作《四庫全書總目》分小學為三類：一、訓詁書，如《爾雅》；二、字書，如《說文》；三、韻書，如《廣韻》。然而，《說文》不能僅視為一部普通的字書，因為一如《爾雅》、《廣韻》，它同樣研究訓詁和音韻問題。《說文》是第一部從頭到尾把這三者合而為一加以系統全面展現的字書。

《說文》的系統就是把文字排列在五百四十部之下；後來發展出第二個系統，即把文字分組排列在韻之下，如《廣韻》。第三個系統是為《康熙字典》設計的二百四十一部首（classifiers），通常稱為「部」（radicals），這個系統至今仍在普遍使用。

第五節 《說文》學和古文字學

《說文》的重要性可從東漢學者的頻繁引用中表現出來。鄭玄注《周禮·考工記》、《儀禮·既夕禮》都引到了《說文》。應劭《風俗通》、晉灼《漢書注》亦有徵引。在漢魏之間，《江式傳》稱「邯鄲淳是研究《蒼》（《蒼頡》）《雅》（《爾雅》）和許慎著作的專家。」⁷⁸〔三國吳〕嚴畯因研究《說文》而見載史書。⁷⁹從東漢到隋末，《說文》受到學者的廣泛研究，變得非常著名。在這個時期，有大量的著作都緊緊摹效許慎的原著。下表是這些成果中最典型和重要的部分，時間大致從西元二世紀中葉到七世紀之初。

⁷⁸ 譯者注：「邯鄲淳」三字英文本頁317誤置於「晉灼《漢書注》」後，今正。《魏書》卷九十一〈江式傳〉：「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頁1963。

⁷⁹ 譯者注：《三國志》卷五十三〈嚴畯傳〉：「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247。

晉	西元 265-419 年	呂 忱	《字林》六卷
		衛 恆	《四體書勢》，書中讚揚許慎
北魏	西元 386-534 年	江 式	《古今文字》
		酈道元	《水經注》，有關《說文》的評論
南梁	西元 502-566 年	庾儼默	《演說文》，擴充《說文》
		曹 產	《字苑》
		未 詳	《說文音隱》，給《說文》注音
北齊	西元 550-577 年	顏之推	《顏氏家訓》，評論《說文》
南陳	西元 557-587 年	顧野王	《玉篇》
北周	西元 557-581 年	趙文深	皇帝命其在《說文》《字林》基礎上 校正文字 ⁸⁰
	?	李 鉉	《字辨》 ⁸¹

唐代國學中，有人從事《說文》和《字林》研究。唐玄宗《開元文字音義·序》說，「關於古文字的著作，《說文》和《字林》是最好的。」⁸²大曆（西元766-778年）間，著名書法家李陽冰號稱自己是唯一能夠寫李斯篆書的人。李陽冰修訂《說文》時，偶爾會改變原書來遷就他自己的解說，所以李陽冰之後出現了兩個版本的《說文》；許慎原本和李陽冰修訂本。⁸³五代後唐（西元923-936年）林罕《字源偏傍小說·序》同時引用了原本和修訂本的《說文》。林書是對許慎《說文》五百四十部首的注釋。⁸⁴

後唐末，徐鉉（西元920-974年）字楚金，世稱「小徐」，編纂了兩種有關《說文》的重要著作：（一）《說文繫傳》，是對《說文》的注釋，共四十篇。由於他把《說文》視為「經」，所以他稱自己的注釋為「傳」，傳是專門用於解經的術語。《繫傳》中的三十篇是由《說文》的本文和徐鉉注構成，有一篇寫對李

⁸⁰ 譯者注：《周書》卷四十七〈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頁849。

⁸¹ 譯者注：《北史》卷八十一〈李鉉傳〉：「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頁2726-2727。

⁸² 譯者注：《開元文字音義·序》「古文字惟《說文》、《字林》最有品式。」〔宋〕王應麟輯：《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卷四十五，頁844。

⁸³ 譯者注：徐鉉表「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跡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說文解字》，頁320。

⁸⁴ 譯者注：林罕《小說·序》：「罕今所篆者，則取李陽冰《重定說文》；所隸者，則取《開元文字》。……今以《說文》浩大，備載群言，卷軸煩多，卒難尋究，翻致悞亂，莫知指歸。是以翦裁浮辭，撮其機要，於偏旁五百四十一字，各隨字訓釋。」《墨池編》，頁28。

陽冰解說的糾正。(二)《說文解字篆韻譜》，此書是把九千多個附有簡注的篆字根據《切韻》的韻目重新排列，共五卷，每一卷繫屬於《切韻》的五聲，此書後又經其兄長徐鉉修訂。徐鉉（西元916-994年），字鼎臣，世稱「大徐」，雍熙三年（西元986年），宋太宗命他與另外三位學者一同校對和修訂各種版本的《說文》。從附在《說文》後的徐鉉〈表〉可知：

- 1 校定本依據的是內府藏抄本及其副本，群臣家藏本。
- 2 徐鉉增加的十九個字不在原書九千多字裡，但出現在許慎的注釋裡。這十九個字列在徐鉉〈表〉後。
- 3 徐鉉增加了四百多字，稱為「新附」(New Additions)，不是《說文》原書所有，卻在許多重要典籍中用過，可以按許慎的系統分類，分別置於恰當的部首之下。
- 4 校定者的新注指出《說文》中的有些字在後世通用中發生譌誤。
- 5 徐鉉列出二十八個《說文》未收的常用字，但是按照許慎的標準，這些字是譌誤的。這些字也列在徐鉉〈表〉後。
- 6 這次的版本增入了自李陽冰以來直到校定者時代的新注。
- 7 根據孫愐《唐韻》給每個字加注反切。⁸⁵

與小徐本相比，大徐本的依賴性是很清楚的，對前人的借鑑不少：

- 1 根據《後漢書》的傳記，許慎作《說文》十四篇。《說文·後敘》也記錄是十四篇，但許沖〈進《說文》表〉、《隋書·經籍志》、《唐書》記錄的是十五卷。這是因為敘和五百四十部首也被算作一篇或一卷。林罕《字源偏傍小說·序》說，李陽冰修訂《說文》為三十卷。⁸⁶小徐本在第一頁就指

⁸⁵ 譯者注：徐鉉〈上說文表〉：「(1) 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2) 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3) 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4) 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5) 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竝序列於後，俾學者無或致疑。……(6) 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7) 《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竝以孫愐音切為定。……」又徐鉉表：「(2) 左文一十九，《說文》闕載，注義及序例偏旁有之，今竝錄於諸部……(6) 左文二十八俗書譌謬不合六書之體。……」《說文解字》，頁321-322。

⁸⁶ 譯者注：林罕《小說·序》：「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復加刊定，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墨池編》，頁26。

出「部首書目和文字數目仍保持原狀，現分每卷為兩部分。」⁸⁷似乎小徐本採用了李陽冰的分卷。大徐本保持了十五篇的形式，但是每篇分為上下卷，所以全書仍是三十卷。⁸⁸

- 2 考慮到上述的情況，從許慎的注文中搜集九千多字頭之外的字，這項工作最早是由小徐開始做的。小徐的書中列舉了七個這種字，其中只有一個跟大徐所列十九個字相同。
- 3 在上面所說十九字表和二十八字表之後，大徐還列舉了十二個字，指出這些字在《說文》中寫作的字體，跟李斯和其他書碑文中的字體略有不同。小徐書中也指出八個這類字，其中有四個跟大徐列舉的相同。
- 4 在大徐的新注中，引用小徐書的次數極多。
- 5 在敦煌發現的抄本之中找到了原隋本《經典釋文·尚書》殘卷。這個抄本引用的《說文》帶著反切，據此可知，從六朝末到隋代，有人已用反切給《說文》注音。小徐本第一頁寫到：「許慎時沒有反切，所以許慎只用『讀若』。後代學者給《說文》注的反切有誤，有時是不完整的。現在都改變（成朱翱的反切）。」⁸⁹
- 6 大徐為小徐的《說文解字篆韻譜》一書出力極多，因此有理由相信，當大徐被詔校定《說文》時，會吸納了不少小徐的著作。

徐氏兄弟的編注本流傳至今，是研究《說文》的最重要版本。更早的版本有清代發現被認為是唐寫本的《說文》卷六木部的一點殘卷。果真為唐寫本的話，殘卷確與大徐本有很大不同。儘管木部殘卷在篇幅長度和文本歸屬上還不能作為可靠的比較對象⁹⁰，但我們知道，二徐本跟這個唐寫本不同，而且二徐本之間也不總是一致的。舉一個例子，小徐本中「讀若」和聲旁比大徐本中多。正如我們所知，李陽冰修訂本《說文》在五代時很流行。李陽冰的觀點在小徐《說文繫傳·祛妄篇》中受到批判。然而，我們認為小徐在某種程度上從李陽冰的書中採納了一些意見。二徐本《說文》分為三十卷，與李陽冰本的分卷正相同。「契」字下，二徐書中都引了《易經》，其中「世」字改為「代」字，以

⁸⁷ 譯者注：徐鍇《說文繫傳》：「部數、字數皆仍舊題，今分兩卷。」（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

⁸⁸ 譯者注：徐鉉表：「其書十五卷，以編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共三十卷。」《說文解字》，頁322。

⁸⁹ 譯者注：徐鍇《說文繫傳》：「當許慎時，未有反切，故言讀若，此反切皆後人之所加，甚為疎朴，又多脫誤，今皆新易之。」，頁1。

⁹⁰ 譯者注：李家浩、李宗焜都主張木部殘卷屬於李陽冰刊定本。參李家浩：〈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為李陽冰刊定本考〉，《文史》2003年第1期，頁209-215。李宗焜：《唐寫本〈說文解字〉輯存》（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5-18。

避李世民諱；由此可知，二徐本所據的正是唐本。作為一個書法家，李陽冰被秦刻石篆書深深吸引，所以他很認真地學習篆書。二徐所處的時代，有不少書法家學習秦刻石，一般認為這些刻石出自李斯的手筆。二徐曾將《說文》篆字跟秦刻石相校對，有如下這些：

- 1 在「及、攸、也」，注出秦刻石的字形寫法，並且注明出自秦刻石。
- 2 大徐〈表〉後所列十二字，通過比較，說明《說文》字形跟秦刻石略有不同。小徐的書中偶爾也會在注釋裡指出這種不同。眾所周知，徐鉉摹寫秦嶧山刻石，並重新刊刻於石。

在情況1中，我們無法斷定，這些材料是李陽冰所增還是二徐所增，但是可以說，這不是許慎的原本。因為《說文·敘》中指明收錄了三種字體，且製作墨拓（*rubbings*）的技術那時還沒有發明。

雍熙三年（西元986年），徐鉉將校定本《說文》進獻給皇帝，皇帝下令雕版印刷（*printing of a woodblock edition*）。今存宋版大徐本數種，已經重印的有：

- （一）《續古逸叢書》本、《四部叢刊》本，據宋本重印，底本原為毛辰所藏，今歸日本人所有。⁹¹
- （二）《平津館叢書》本，孫星衍據宋本重印。孫氏原版又被重印為「藤花樹《說文》」⁹²，清木刻本。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這三種印本是據北宋「小字本」《說文》重印。清代學者可以見到更多宋版，其中一些不是全本。

小徐本在北宋時已不全。《小學彙函》的覆北宋版⁹³，有蘇頌熙寧二年

⁹¹ 譯者注：此兩本皆為上海涵芬樓據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藏本影印。

⁹² 譯者注：此句英文本頁326作「Sun's original woodblock and reprinted by so-called T'eng Hua Hsieh Shuo Wen（藤花樹《說文》）」句不可通，疑「and」是「was」之誤。據現在的研究，孫星衍借額勒布藏宋本刻印，且額勒布藤花樹本刊於嘉慶十二年（1807），孫星衍平津館本刊成於嘉慶十五年（1810）前後，自是額本在前，孫本在後。參董靖宸：〈孫星衍平津館仿宋刊本《說文解字》考論〉，《勵耘語言學刊》2018年第1輯；董靖宸：〈藤花樹本《說文解字》底本及校刊考〉，《文獻》2019年第6期。

⁹³ 譯者注：英文本頁326原作「小學類函」，今正。見〔清〕鍾謙鈞輯《古經解彙函》。又按：「覆北宋版」，不確。李兆洛跋語稱《繫傳》所據底本是汪世鐘的「宋槧不全本」和顧廣圻的「影宋鈔足本」，「汪本人誇為北宋本，甚精雅可喜，而按《通論》卷中容字缺筆，則亦是南宋本耳。今刻款式依以為式，無者則以宋鈔本足之。」《說文解字繫傳》，頁345-346。董靖宸說：「顧廣圻約在嘉慶初年，據毛辰抄本《繫傳》錄副。道光十七年（1837），祁寯藻自顧廣圻孫瑞清處，借得顧廣圻舊藏《繫傳》抄本，刊成祁刻本《繫傳》。」〈毛辰手校《說文解字繫傳》抄本源流考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3輯（2019年），頁148。

(1069) 跋尾，說「此書舊闕第二十五、三十這兩卷；(我)一直期待能發現這兩卷，加以補全。」⁹⁴還有一篇尤袤乾道九年(1173)跋尾，說「閒暇時，我將宮廷雜亂的圖書進行整理和分類。我發現了徐鉉的《說文繫傳》。我喜歡此書的博洽有根據，但此書一半斷爛，無法閱讀。」⁹⁵李燾(1114-1183)在《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中說，「我努力搜求此書多年，但只得十之七八，卷帙不完，文字也常訛誤。我常因不能得到全本而歎息。」⁹⁶元代黃公紹編纂了一本叫《韻會》的韻書，其門客熊忠將此書簡編為《韻會舉要》。這兩書相對準確地引用了《說文繫傳》。《說文繫傳》似乎在《會要》的引文中保存得比今傳本更好。段玉裁利用和引用該書中的《繫傳》。

徐鉉的第二本書《說文解字篆韻譜》，是把九千附有簡注的篆字按照《切韻》的韻目分類。此書分為五卷，每一卷分別屬於《切韻》系統的五聲下。南宋李燾將徐鉉書改編為《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給《說文》編製了五聲韻表，兩書的不同如下：

- (一) 徐鉉書雖按《切韻》系統編次，但每一韻下的字則是沒有次序的。李燾書按《切韻》編次，且每一韻下的字又按司馬光《類篇》的結構分類法排列。
- (二) 徐鉉書只有極簡的注釋。其目的是為了檢索文字的方便。李燾書抄錄了許慎所有的注釋和解說，因此《說文》以不同的編排形式完全保存在書內。⁹⁷

徐鉉書板行之後，超過了徐鉉書的地位；李燾書的面世，則取代了徐鉉書。在明代，李燾書多次重印，廣為人知。以致於清初最偉大的學者顧炎武甚至都不知道李燾書不同於徐鉉書，因為顧炎武說，「我們無法見到《說文》原本的次

⁹⁴ 譯者注：蘇頌：「舊闕二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別求補寫。」《說文解字繫傳》，頁342。

⁹⁵ 譯者注：尤袤：「余暇日整比三館亂書，得南唐徐楚金《說文繫傳》，愛其博洽有根據，而一半斷爛不可讀。」《說文解字繫傳》，頁344。

⁹⁶ 譯者注：李燾：「今《韻譜》或刻諸學宮，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宋〕魏了翁輯：《鶴山渠陽經外雜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3。

⁹⁷ 譯者注：英文本頁327，「Hsü's book was not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Ch'ieh-yun system, but under anyone rhyme, the group was given no order.」今按，「not」疑衍。徐鉉《韻譜·前序》稱「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它。故聊存詁訓，以為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焉。」《徐鉉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1066。李燾：「《韻譜》誠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傍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鶴山渠陽經外雜抄》，頁14。

序。現在的順序都是徐鉉按四聲排的。」正如上面說過的，這是錯誤的。⁹⁸

《說文》逐漸被忽略和廢棄，並被兩種替代品所取代：

- (一) 漢代以後有許多字書，收錄了《說文》之外的文字。直到明代，梅膺祚撰《字彙》，張自烈撰《正字通》，這些普通字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也是《康熙字典》的來源。這些書的應用取代了《說文》。
- (二) 六朝以後，韻書變得最為重要。韻書可以用作字典和滿足寫詩押韻的需要。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編纂自己的韻書。

這兩類書的成功，主要是因為能運用到許多人的日常事務中。正如我們指出的，漢代的古文字學研究，是經學研究的副產品。漢以後的宋、清，也極其重視經學研究，但卻秉持截然不同的態度，取得了不同的成果。大致可以說，宋代學者注意於全體大義，直覺理解，個人解讀，利用經書的材料建構他們自己的哲學。清代學者特別強調遵從漢代學術的道路，他們專注於用客觀的和分析的方法研究經典著作，把典籍視為歷史材料。古文字學的研究自然而然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助手，並逐漸發展，取得了獨立的地位。宋學和清學在方法和成果上的不同，可以從金石學研究（the study of bronzes and stone monuments）中得到最好的體現。宋代學者研究金石材料，是當作書法上的美學模範，而清代學者則把金石學發展為研究經史的輔助。現代學者視金文和石刻跟書面材料同等重要。就清代學者而言，這種態度的結果是古文字學研究僅限於《說文》範圍之內。少數學者嘗試利用金文作歷史文獻證據的補充材料。個別學者甚至嘗試建立一個中國文字的新系統，但是失敗了。唯一成功的是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補充《說文》的古文和大篆字體」），就是基於對漢代以前古器物的研究。他指出，許慎提到的所謂孔壁「古文」，僅僅是晚周的字體，即七國時期。⁹⁹然而，段玉裁認為許慎敘中提到的「古文」是蒼頡所造。段玉裁的古文

⁹⁸ 譯者注：此段表述本自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序》，其文曰：「《說文解字》一書，自南宋而後有二本：一為徐氏鉉奉敕校定許氏始一終亥原本也，一為李氏燾所撰《五音韻譜》。許氏五百四十部之目，以《廣韻》《集韻》始東終甲之目次之，每部中之字又以始東終甲為之先後。雖大改許氏之舊，而檢閱頗易，部分未泯，勝於徐氏《篆韻譜》遠矣。自李氏而前有二本：一即鉉校定三十卷，一為南唐徐氏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自鉉書出而鍇書微，自李氏《五音韻譜》出而鉉書又微。前明一代多有刊刻《五音韻譜》者，而刊刻鉉書者絕無，好古如顧亭林，乃云『《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噫！其亦異矣！」《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4冊，頁329。

⁹⁹ 譯者注：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敘》：「竊謂許氏以壁中書為古文，疑皆周末七國時所作，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非復孔子六經之舊簡。雖存篆籀之跡，實多譌偽之形。」《說文古籀補三種》（北京：中華書

字學著作得到了應有的聲望，但他卻沒有吳大澂敏銳，因為吳大澂看到了材料的重要性並加以利用。清代學者鮮有例外地集中注意力於《說文》研究。其中大部分著作收進了丁福保編輯的大型彙編書《說文解字詁林》中。《說文》四大家的著作（也收在《詁林》中），產生於清代中晚期，分別是：

- （一）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一部對《說文》極為重要的注釋書。此書重視文本校勘問題，企圖重建許慎的原著。但偶爾也有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對文本的修改。
- （二）桂馥《說文解字義證》。關於《說文》的注釋和書證。專注於對每個字的訓釋，且沒有編者自己的意見。每個字下羅列了所有可用的材料，能夠說明每個字的發展。
- （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收集故訓，按讀音排序。朱駿聲根據清代在古語文學上的研究，把《說文》重新編排為二十一部分；每一部分是一個韻部，秩序井然，使語音（尤其是元音）跟字義的關係易於確定。
- （四）王筠《說文釋例》。對《說文》體例的解讀。此書強調和發展了許慎所採用的造字原則的具體表述。

還有一些其他研究《說文》的重要著作，但上述四種是關於《說文》研究最重要的參考書。正如我們提到的，《說文》是古文字學研究中最重要材料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這是現代學者區別於清人認識的第一點。第二，必須認識到《說文》是連接古今文字的橋梁，但即便得到了完整的許慎原本，《說文》本身仍然會受到許多批評。如果我們承認甲骨文、金文作為更早材料的重要性，那麼我們不得不把《說文》定為第二位的材料。但是不得不說，如果沒有《說文》，古文文字研究即便能夠推進，也將會非常困難。因此，《說文》在連接古今文字上的貢獻具有非常重大的價值。第三，許慎缺乏早期的材料。他在每個字下面的注釋有時是錯誤的，有時討論的不是最早的字形。同樣的原因，他沒有關於文字演變的清晰看法。最後，他的六書系統是不完整的。上述評論是現代學術的觀點，儘管如此，《說文》的價值絕不容低估。

在吳大澂的書中很明顯是將銘文和材料證據作為次於《說文》的第二位。

局，2011年），頁5。又參裘錫圭：〈吳大澂〉，《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三卷，頁478-479。

直到孫詒讓的時候，才清楚地認識到《說文》只是古物的補充。孫詒讓在《名原》（文字的起源）序裡說「許慎的材料要比甲骨文金文晚得多，只有從商周文字中，我們才能發現文字的起源和演變。」¹⁰⁰許慎對文字的研究是靜止的，而孫詒讓則看到文字持續不斷的演變過程，因此他對文字形音義的態度跟傳統的方法大異其趣。可以說，這是文字研究中的偉大變革。¹⁰¹小學、《說文》學和現代古文字學（modern palaeography），標志著中國人研究文字和古文字的三步。現代古文字學通過對銘文的科學研究和在考古學的幫助下成熟起來。¹⁰²

中國人的觀念中，漢代以後為「今」，漢代以前的古物、典籍、文字稱為「古」。有關的歷史記載，如漢武帝時宮廷收藏有一件齊桓公時的古代青銅器（《封禪書》），漢宣帝時，有人在美陽縣發現了一件叫鼎的青銅器（《郊祀志》），張敞可以讀上面的銘文。東漢和帝時，在匈奴發現了一個鼎（《後漢書·竇憲傳》）¹⁰³許慎《說文·敘》也說，「山川之地常常發現青銅器。」但我們認為許慎在他的書中從來沒有使用青銅器銘文的材料，因為墨拓的技術直到六朝時才發明。唐開元時有十三葉魏正始三體石經（three-type-character stone classics of the Cheng Shih of the Wei dynasty）的拓本。唐初所謂石鼓（stone-drums），實際上是春秋戰國之際秦國的刻石，被傳拓下來，間或重雕於木上。宋代學者不僅收集石刻，而且對收集青銅器也感興趣。青銅器研究可分為兩派：

¹⁰⁰ 譯者注：孫詒讓：「今《說文》九千字，則以秦篆為正，其所錄古文，蓋摺拾漆書經典，及鼎彝竅識為之。籀文則出於《史篇》，要皆周以後文字也。……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跡，上推書契之初軌。」《名原》（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219。

¹⁰¹ 譯者注：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進一步闡發說：「他（孫詒讓）在《契文舉例》序上說他看了《鐵雲藏龜》後『迺略通其文字，大致與金文近，篆畫尤簡省，形聲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能盡識。……今就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以尋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跡』。後一年作《名原》，企圖『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跡，上推書契之初軌』，以甲文、金文、石鼓文等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著省變之原，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名原·序》）。我們在此應指出，偏傍的分析不能算作孫氏的創見，因為許慎的《說文解字》最先分別部居、剖析形聲，乃鋪陳文字於平列的不動的靜態中加以分析。孫氏將不同時代的銘文加以偏傍分析，藉此種手段，用來追尋文字在演變發展之中的沿革大例——書契之初軌、省變之原或流變之跡。他對於古文字學的最大貢獻，就在於此。」（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頁55-56。

¹⁰² 譯者注：陳夢家《略論文字學》（1957）：「從認字課本的『小學』發展為記載與分析經典文字《說文》，再從為經學附庸的《說文》發展為獨立的學科——文字學。從《說文》的研究發展為古文字學的研究，大約經歷了二千多年的歷史。這門學科，對於經學、史學和考古學的研究，盡了向前推動的作用。若使沒有《說文》在本書，我們很難通讀漢以前的書籍，很難通讀出土的殷、周古器物銘文。沒有它，我們難以在考古學上作斷代史研究的工作，我們也就無法利用地下發掘出來的古代文字記錄。我想，這門學科對於研究古代是一把少不了的鑰匙，是無需詳說的。」《夢甲室存文》（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36-237。

¹⁰³ 《後漢書》卷二十三《竇憲傳》：「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817。

- (一) 強調青銅器的造型、裝飾和設計。主要興趣是青銅器跟典禮的關係。
- (二) 強調銘文。對書法更感興趣。這一派傾向於歷史研究。

由於青銅器銘文字數不斷增多，於是這些古文字被收集到字書裡：

- (一)《考古圖釋文》，按韻編次。此書收錄的是《考古圖》發表的銘文。《四庫全書》本署為呂大臨撰。
- (二)《鐘鼎篆韻》，按韻編次青銅篆文。政和中王楚撰。今佚。
- (三)《集篆古文韻海》，按韻編次篆文和古文。宣和中杜從古撰。
- (四)《鐘鼎篆韻》或《廣鐘鼎篆韻》，對（二）的擴充。南宋紹興間，薛尚功撰。《郡齋讀書志》說：「元祐中，呂大臨只收集了幾百字。政和中，王楚也才收集了幾千字。現在此書一共收集了一〇一二五字。」¹⁰⁴今佚。
- (五)《鐘鼎集韻》，〔金〕黨懷英撰。
- (六)《增廣鐘鼎篆韻》，對（四）和（五）的再擴充。〔元〕楊鉤撰。今存。
- (七)《續古集韻》，〔元〕吾邱衍撰。今存。
- (八)《集鐘鼎古文韻選》，〔明〕釋道泰撰。
- (九)《金石韻集》，〔明〕朱時望撰。
- (十)《鐘鼎字源》，〔清〕汪立名撰。康熙五十五年板行。以（九）為基礎，收集五千四百字。

清乾隆間，宮廷收藏極為豐富。高宗皇帝於乾隆十四年，下令編纂《西清古鑑》，有繪圖和銘文。此書出版於乾隆二十年，之後皇帝下令編纂了三種同類圖書。在私人收藏變得非常流行以後，阮元（一位高官及大學者）出版了一本叫《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書。此書影響巨大，因為阮元本身是一位研究經學和古文字學的學者。學者們逐漸開始利用金文的材料來研究歷史和古文字學。許多研究和探討這些材料的著作在此時出版。這一領域研究的進展得益於下列因素：

¹⁰⁴ 譯者注：晁公武：「《鐘鼎篆韻》七卷。右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68-169。

- (一)《說文》學，受文本限制，已經達到極限。
- (二)經學和史學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
- (三)印刷技術的進步；石印、珂羅版、照相製版法。
- (四)古器物的發現和發掘。

最後一點對理解「金石學」轉變到考古學領域最重要。道光初，漢代封泥在四川發現。同治和光緒年間，山東也有所發現。封泥和蠟封相似，但是是用黏土做的，蓋印的是官員的職官名。同時戰國陶器銘文也在山東臨淄、歷城，河北易州發現。光緒二十五年，商代甲骨在河南安陽發現。這些發現對古文字學的發展至關重要。光緒二十六年，新疆發現了魏晉時竹簡和木牘。三十二年又在甘肅敦煌發現了漢代簡牘，以及帛書，和唐代手抄本。由於以上諸多發現，「金石學」的舊名已不足以涵蓋考古學新發現的發掘品。¹⁰⁵現在稱為「古器物學」(The Study of Antiquities)，由這一表述產生了另一稱呼「古器銘學」(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最近幾年，科學發掘的方法已經運用起來，於是有了第三個名字叫「考古學」(Archaeology)。考古學一詞常被誤用為廣義上包含前兩者。古文字學研究和歷史研究受益於古器銘學和考古學而獲得很大提高和進步。

現代古文字學把不同領域的所有技術手段結合起來，來完成古文字研究工作。歷史學、語文學、古器銘學、《說文》學和考古學結合到一起，放在重建過去(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這一共同主題之下。近些年，有些學者沒能意識到這種結合與平衡的重要性，有些人還在不斷地強調《說文》研究的重要，而另外一些人過分貶低《說文》；結果不能正確地按年代排列出文字的演變序列，因為上述其他領域的研究所提供的證據被遺漏了。顯然，科學的古文字學研究才剛剛開始。

第二章 漢字的起源

第一節 起源時間

對於「中國文字何時發端？」這個問題，很難做出任何確切回答。第一，

¹⁰⁵ 譯者注：此段說法本自王國維〈齊魯封泥集存序〉：「洹陰之甲骨、燕齊之陶器、西域之簡牘、巴蜀齊魯之封泥，皆出於近數十年間，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該之矣。」《王國維全集》第八卷，頁470-471。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王國維全集》第十四卷，頁239-244。

沒有最早階段文字的資料。第二，傳統關於文字起源的故事都來自神話和傳說。第三，早期國家的年表（**chronology**）還不清楚。如果相信許慎《說文·敘》的說法，文字是黃帝的史官蒼頡所造，那麼黃帝時已經有書面文字了。即使這是真的，我們仍然不能推定其發生的時代。有人認為夏代已有文字，因為宋人著錄的青銅器有些認為是夏代的。然而，現代考古學迄今還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能指明夏朝所處的年代或地域。此外，根據《論語》中一句有歧義的句子，有學者認為堯帝時期已有文字。¹⁰⁶根據甘肅辛店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彩陶（**painted pottery**），有學者把文字的時代追溯到那個時期。另有學者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懷著這樣的信念：中國的象形文字（**pictographs**）可以追溯到大約一萬年以前。¹⁰⁷顯然，我們不能接受這些假設和猜想。現在唯一確定的是發現的商代晚期證據，表明那時文字已經使用了一定時期。這一時期大多數文字是在甲骨和青銅器上，小部分文字是手寫在陶器、玉器和石頭上。從商銘文刻辭中可以得到如下事實：

- （一）漢字的基本結構已經形成：象形（**pictographs**）、形聲（**phonetic compounds**）、聲假（**phonetic borrowing**）。
- （二）商代銘刻文字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後代文字的靈活性沒有這麼大，且趨於穩定化。
- （三）商代使用象形字的頻次比形聲字高。後來使用形聲字的頻次更高。
- （四）商代有許多族氏名（**clan-names**）、私名（**personal-names**）、國名（**names of states**）、地名（**place-names**），後來消失了。
- （五）因為銘刻文字全都出自王室，對於庶民的文字我們所知甚少。
- （六）句法並沒有跟後代截然不同。商和西周的銘刻文字，有些人稱代詞有格和數的區別；這一用法後來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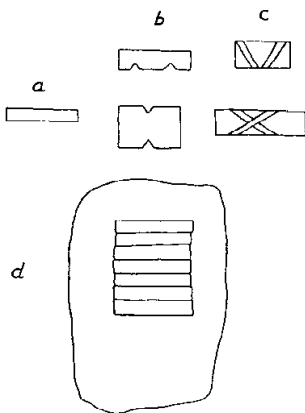
¹⁰⁶ 譯者注：重訂本：「《論語·泰伯》孔子道堯『煥乎其有文章』，就以為堯時已有文字。」頁247。

¹⁰⁷ 譯者注：這是針對唐蘭的說法而言的，《古文字學導論》（1935）說：「安特生在《甘肅考古記》裡把一些骨板上所刻的記號，疑為文字。其實他所搜集的『辛店期』陶甕上，卻確有文字，雜置在圖案中間，不過他以為是花紋罷了。……我們在文字學的立場上，假定中國的象形文字，至少已有一萬年以上的歷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備，至遲也在五、六千年以前；而形聲文字的發軔，至遲在三千五百年前。這種假定，決不是誇飾。」《古文字學導論》改訂本（1936）說：「據安特生的假定，辛店期離現在大概有四千五百年左右。這時期的文字所知道的只有這些，當然還不夠做什麼研究，但大體上我們已能斷定它們和商周文字是同一系統。這時期裡或許還沒有形聲文字，而商代文字裡早已有了。我們假定形聲文字的產生在三千五百年至四千年以前，那末，中國文字的起源總在六～七千年前吧！」（濟南：齊魯書社，1979年），頁77-80、397-399。

由此可知，在某種程度上商代文字是先進的，但與創始階段相比，沒有特別重大的進步。因此文字的發生似乎距離這個時期並不久遠，或許五百年到一千年。

河南的仰韶、甘肅的辛店、馬廠、半山，這些地方發現的彩陶，偶有動物裝飾，但沒有文字。安特生（Anderson）寫到：

此期的墓葬（西寧縣周家寨遺址）發現的隨葬品中，有一些骨製品值得特別注意（圖三）。即小的矩形骨板，要麼像（a）一樣光滑，要麼像（b）、（c）一樣雕琢。有時這些骨板一小組一個挨一個放著，如（d）所示。我猜想這些骨板代表某種原始的文字或記錄了一些跟死者有關的抽象概念。（注：安特生：《甘肅考古記》，《地質專報甲種》第五號〔1925年6月〕，頁14。）



圖三：（安特生）骨板有可能代表一種原始文字。仰韶期。西寧縣，周家寨。¹⁰⁸

接著說到：

在對甘肅所有大範圍的史前遺址發掘中，從沒見過在陶器或其他物件上有一點文字的跡象，儘管我們把注意力始終集中於這個方向上。（仰韶期的雕刻骨板，見前述頁14，最多是某種原始的記錄，跟中國古文字毫不相關。）（注：同書，頁30。）

¹⁰⁸ 譯者注：英文本缺此插圖，今據安特生《甘肅考古記》補，《地質專報甲種》第五號（北京：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5年），頁11。

巴爾姆格倫（Palmgren）寫甘肅隨葬陶器說：

在半山和馬廠陶器中，偶爾發現有隨葬彩繪器皿，上面的記號並不直接跟器皿上其他連貫的紋飾相關。這些記號幾乎都使用黑色和紫紅色，與器皿上其他紋飾顏色一樣。拉完坯、曬乾之後，在燒造之前，會將記號繪在器皿座上或底上……（注：巴爾姆格倫：《半山及馬廠隨葬陶器》，《中國古生物誌·丁種》第三號〔北平，1934年〕，第一冊，頁174。）

之後作者寫道：

除少數例外，幾乎所有記號的結構是極其簡單的。那些例外在前面已有所討論。跟器皿上的其他紋飾相比，這些被視為繪畫的記號是極端原始的。再者，它們出於草率，畫的時候往往極為隨意。它們明顯是記錄詞語和數字的嘗試，這即是說，文字的一種原始形式。（注：同書，頁179。）

安特生提供的六期甘肅遺址，時間追溯到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到前一千五百年。（注：安特生，同書，頁27。）¹⁰⁹





仰韶 3200-2900（半坡） （西元前2600-前2300年）

（注：括號中的數據是梁思永校正的數值，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頁564。）

馬廠 2900-2600 （西元前2300-前2000年）

上述觀點表明，一般說來，西元前二千年以前還沒有文字。陶器上的記號僅僅是一種符號（symbol），後來的文字並非從這種記號（marks）衍生出來的。歷城龍山陶器上發現同時刻有記號和文字。龍山文化分為兩部分：1.下層，黑陶，2.上層，灰陶。從龍山一共得到了八十八片有記號的陶片，其中只有三片是下層的。這些陶器表明，豆器（形似高足杯或臺燈），總是刻在足或腹上；甕器

¹⁰⁹譯者注：安特生：「基於上述認識，可以推測甘肅遺址的六個文化階段涵蓋了從西元前3500年到西元前1500年之間的大部分時間。」《甘肅考古記》，頁31。陳夢家英文本作「1700」，當是「1500」之誤，今正。

(形似罐)，刻在外口沿上；盆器（形似盤），刻在內口沿上。¹¹⁰所有刻畫陶器出自上層，其中約有四片（注：參《城子崖》，李濟、梁思永、董作賓編輯：《中國考古報告合集之一》〔南京，1934年〕，圖版拾陸：圖10 , 12a , 14 , 17 )跟安陽發現的甲骨上的文字一樣。¹¹¹梁思永鑒定龍山文化下層的年代在西元前二千三百年～前二千年之間，從現有材料看，最早的文字大約發生在西元前二千年至前一千三百年之間。這一時期也包含了夏代。我們現在或許可以謹慎地說，文字在西元前二千年之後已應用了，但極有可能不會早於這個時間。已知最早的銘刻文字是安陽的甲骨，但早期青銅器上的銘文可能並不總比甲骨的時代晚。

第二節 漢字字形的由來

許慎《說文·敘》寫到，在蒼頡造字之前，先使用的是八卦（Eight Trigrams）和結繩（knotted string）。然後他說，「根據事物的分類，去模仿其形狀。」這意味著，早期的文字來自事物的圖畫（pictures）。他還使用「書契」這個術語來指「文字」；字面上，「書」謂「文字」，「契」謂「符券」（tally）；這就給人造成了一種錯誤印象，誤以為早期文字源自符券。

說起八卦和結繩，我們再引《說文·敘》第一段：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

此段改編自《易傳·繫辭下》，下面是許慎引用的那節：

¹¹⁰ 譯者注：《城子崖》：「在所收集的二萬餘塊陶片裡，共有八十八片上劃有記號。按它們的形狀分別可得十八類。……統計此八十八片刻號陶片，其中豆類七十七片，即87%；甕（或曰罐）佔八片，約10%；其餘佔3%。……豆上的記號多刻在盤托旁，或盤心，甕上的記號則在口外緣上，盆上的記號則在緣之內部。總之，都是刻在惹人著目的地方。」《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南京：中研院史語所，1934年），頁53。

¹¹¹ 譯者注：英文本頁344，據《城子崖》補陶文圖。與甲骨文相同的陶文尚多，參李濟《殷墟陶器研究》第七章〈符號與文字〉，圖67-70，《李濟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劉一曼：〈殷墟陶文研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捌〈殷墟出土的文化遺物〉（七）〈陶文與符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徐在國：《新出古陶文圖錄》（合肥：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古者……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繫辭下》的原文與許慎的引文相比，可知：（一）八卦和文字之間沒有關係；（二）神農和結繩之間沒有關係；（三）結繩和文字之間有關係。在許慎的改編下，產生了一種文字發展序列的新觀念。從伏羲到神農，最後到蒼頡的變化，是從八卦到結繩，再到文字的進化。

八卦起源於用蓍草占卜（divination by stalks and the milfoil）系統。這是周人最早使用的，我們在甲骨刻辭中沒有發現八卦存在的證據。¹¹²八卦僅僅是兩個對立符號的結合。八卦代表八種基本的分類；例如坤卦，是三個消極成分的結合，象徵或代表了土地、母親、盆罐、吝嗇、均衡、母牛、大車、紋飾、大眾、手柄、土地的黑色。¹¹³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八卦是一種象徵性的標記，遠非文字。

利用結繩來算數，在藏族、苗族和山西販夫中至今仍存。《文心雕龍·書記篇》說，「古時候（人民）淳樸簡單，結繩執契（如，為某物作擔保）。現在的羌和胡（邊疆民族）還在板子上結繩計數。」¹¹⁴山西販夫在運送貨物時，在貨箱上繫一皮繩，用打結的方式來記錄收支狀況。嚴如煜《苗疆風俗考》說，苗民不知文字。他們記憶力很好，但有時用結繩來防止遺忘。¹¹⁵這個方法在全世界初民中都很常見。這只是輔助記憶一些數字，跟文字毫無關係。《莊子·胠篋篇》說，「在伏羲、神農和其他古代統治者的時代，人們使用結繩。」¹¹⁶此篇的撰作晚於《繫辭》，可能成於漢代。許慎的改編出自這一材料。¹¹⁷

¹¹² 譯者注：後來張政烺指出甲骨文存在數字卦。〈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1980）指出〈一九五〇年春音序發掘報告〉著錄的四盤磨卜骨中的數字卦對應易卦中的明夷、否、未濟。張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1985）又指出了殷墟甲骨上四個數目字組成的筮法，共三組。《張政烺文集·論易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賈連翔《出土數字卦文獻輯釋》第二章實占數字卦資料輯錄，輯錄商甲骨數字卦七組（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

¹¹³ 譯者注：《周易·說卦》：「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十三經注疏》，頁185。

¹¹⁴ 譯者注：《文心雕龍·書記篇》：「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繆，其遺風歟。」，頁186。

¹¹⁵ 譯者注：《苗疆風俗考》：「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遞傳，以鼠牛虎馬記年月，暗與曆書合。有所控告者，必倩土人代書。性善記，懼有忘，則結於繩；為契券，刻木以為信，太古之意猶存。」《苗防備覽》（長沙：嶽麓書社，2021年），頁228。

¹¹⁶ 譯者注：《莊子·胠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369。

¹¹⁷ 譯者注：「重訂本」說：「許慎所以改『上古結繩而治』為『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者，因為《莊子·胠篋篇》（作於《易傳》後）曰……」，頁251。

《繫辭》的作者和許慎都使用「書契」來指「文字」，這是錯誤的。《周禮》也使用了「書契」；根據鄭玄注，這個術語有兩種意思：（一）在《小宰》《宰夫》《酒人》章，注「書契」為「符券」。（二）在《司會》《大司馬》章，注「書」為「簿書」，「契」為「最凡」。¹¹⁸鄭玄注《質人》章，「書契是『商品交易用的符券』，符券的形制是在兩塊木簡上書寫，並在兩邊刻上記號。」¹¹⁹鄭玄注《繫辭》也有相似的表述，但補充說，木簡給交易雙方作為日後核實的憑證。這是「契」原初的意義，「契」是兩個木簡的結合，所以「左契」、「右契」出現在《曲禮》、《老子》、《史記》中¹²⁰，木簡上的記號叫作「齒」，「齒」的數量表示了契約數字的大小。在近年出土的木簡中有這類的符券。它們正是鄭玄所描述的那樣，把交易或契約寫在平整的表面，邊緣刻著適當數量的記號。我們相信在原始時期，人們使用的符券僅僅刻「齒」以記數，而契約是口頭上的。《鄴中片羽》著錄了一對玉，有四道平行記號貫穿其邊緣，這可能是古代的符券。¹²¹或許可以猜想，安特生描述的骨板也是這一類型的符券。苗族還在使用的符券，僅刻「齒」，而不書寫契約的內容。

由上可知，結繩、八卦、符券，都不是文字，八卦是符號，另兩例是數字標記。中國的文字只是源於圖畫。正如許慎所說，「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象形者，隨體詰屈，畫成其物。」由此可知，最早的文字起源於畫圖的方法。

在古代中國，畫一幅圖和寫一個字的方法是相似的，甚至使用的工具也一樣，因為都使用毛筆。有些學者認為，在甘肅新石器陶器上發現的繪有人、鳥

¹¹⁸ 譯者注：陳氏此說本自孫詒讓。《周禮·天官·小宰》「聽取予以書契」鄭注「書契，謂出予受人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孫詒讓云：「《說文·大部》云：『契，大約也。』凡以文書為要約，或書於符券，或載於簿書，並謂之書契。若《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酒正》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予之』，《質人》『掌稽市之書契』，此謂符券之書契，故《質人》後鄭注謂『書兩札，刻其側』，是其制也。若《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大司馬》云『群吏選車徒，讀書契』，此謂簿書之書契也。此云聽取予以書契，與《酒正》之書契同，自指符券而言，故先鄭前注以符書為釋。然取予之書，亦自當有簿書。符券、簿書，二者並為凡要，故後鄭有增成其義。……云『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者，最亦取之借字。最目猶凡目、總目。《司會》注云：『書調簿書。契，其最凡也。』……」《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76。又，英文本 Chiu-jen（酒人），應是「酒正」之誤。

¹¹⁹ 譯者注：《周禮·地官·質人》「掌稽市之書契」。鄭注「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孫詒讓云：「此謂符券之書契也。書兩札，各持其一，則有左右，故《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注云：『契，券要也。』《老子》云：『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右契左契合之即兩札也。刻其側者，蓋依其取予之數，刻札旁為記。」《周禮正義》，頁1078。

¹²⁰ 譯者注：「重訂本」：「《曲禮》『獻粟者執右券』，《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史記·平原君傳》『操右券以責』，《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公常執左券以責于秦韓』，《史記·馮驩傳》『皆持取有錢之券合之』，可知契券對合如符。以齒對合，故契有齒。」，頁252。

¹²¹ 譯者注：見黃濬：《鄴中片羽》（北平：尊古齋，1937年），第二集，卷下第二十八葉「玉合符」。

和動物形的裝飾，是最早的文字。正如我們所知，陶器上刻畫的記號或文字，常在一個特定的位置，以便於辨識，與紋飾或繪畫形成鮮明的對照。青銅器上的銘文也是一樣，很少有例外。顯然，陶器上的圖案是繪畫而不是文字。下面對古代中國的圖畫和文字試加以區分。

（一）如果繪畫和文字同時出現在一件器物上，那麼對兩者的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新石器彩陶，商代陶器和青銅器都能證明。很明顯地，在較早作品中紋飾最重要，而銘文次之，然而在秦代及以後，正如石刻中所見，紋飾無疑成為次於銘文的從屬地位。¹²²

（二）文字是特定群體用來交流思想、觀念和感覺的一種媒介。為了交流的目的，使用者必須保持文字書寫形態的穩固。儘管有時寫字有隨意性，但大多數時候是一致的，而且總是有一種趨於簡化和限制大小的強烈的傾向。

（三）字形的簡化和限制大小，使文字逐漸脫離於圖畫，並發展為一種近於抽象的簡單結構。此最後形體仍然保持來自圖畫階段的強烈印象。

（四）文字在具有共同語言的群體中使用。因為漢語是單音節的，人們用口語來讀文字，所以每個字就有一個單音節的讀音。在句法上，古代書面語和口語是相一致的。

（五）因為族群愈加複雜，且對文字產生更大需求，文字不斷增加且變得更為複雜。文字的簡單部件加以組合，複合，或分化為簡單零件，意義上的引申，從其他事物假借聲音。¹²³

第三節 有關「文字」的術語

漢初以前有三個不同的術語用來指「文字」；分別是：

（一）戰國時期的術語是「文」。《春秋左氏傳》中解說字形，用「文」來指「文字」。古文字「文」象身上有紋飾的君子之形（*pictograph of a gentleman*），引申義「裝飾，色彩，優雅，有教養」可能來自這一源頭。

（二）戰國晚期或稍早，用術語「名」；名的本義是「名字」。《論語·子路》「孔子說：『必須糾正文字』」鄭玄注：「『正名』謂『糾正書面文字』」。古代

¹²² 譯者注：「重訂本」表述書畫區別的相應部分，後有陳氏批注云：「參英文本。最古之銘刻在器物一定的地位上。」頁255，可見在撰寫英文本時，陳氏增添了一些新的思考。從「重訂本」批注的內容看，是吸收了英文本的一些新材料之後加上的。

¹²³ 譯者注：「甲編本」：「形體的變化，聲音的假借，意義的引申。」，頁24。「重訂本」：「每一個字的形音義的文字發展中不是固定的。『形』有形的變化，『音』有音的假借，『義』有義的引申。」，頁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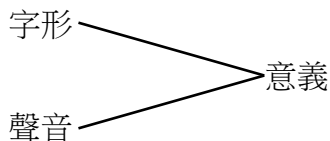
叫名，現在叫字。」¹²⁴《儀禮·聘禮》「（如果有）一百個以上的名，就書寫在竹簡上。」鄭玄注：「名，即書文（written characters），現在叫做字。」《周禮·外史》「（他的）職責是將書名傳達到四方。」又《大行人》「（男孩）九歲時，讓瞽史（blind historian）教他書名。」鄭玄注並與前同。《管子·君臣篇》「用相同的名來書寫。」這是說書寫相同的文字。「名」的字形是月、口兩形相結合。可以有三種解讀方式：1.人們在新月下說話，稱呼彼此的名字，為會意（assembly of ideas）。2.月是聲符（phonetic symbol），正如月在「明」中的作用，既表音也表義。「明」的意思「光明」，是日和月結合的結果，但又從「月」得聲。3.「名」是個形聲字，圖像和聲音結合。

（三）秦始皇時，開始使用複合詞「文字」。最早出現在瑯琊臺刻石中。此後，文字一詞沿用至今，有時或省稱為「字」。「字」象小孩在房屋的庇護下之形，本義是「保育」，引申有「繁殖」義，因為文字是隨時間增多的，所以「字」借用來指「文字」。這是假借的一種。

正如許慎的定義，「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名」是口語中事物的名字，成為指同一事物的文（pictograph）或字（character）的讀音。文、名、字，即象形、聲音和形聲，是三種基本類型，儘管術語有些晚起，但卻非常巧妙且有用。我們使用這些術語表示文字發展的三個階段（three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和漢字結構的三種基本類型（three basic types i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第四節 漢字的基本類型

每個漢字有三個方面：字形結構、聲音、意義，這三者間的關係不是平等的，一個字的意義源自字形或聲音。下面的簡圖更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重要論點：



有三種方法可以用來表達一個概念（idea）：

¹²⁴ 譯者注：皇侃義疏：「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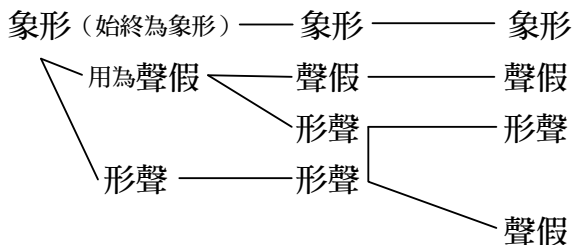
(一) **通過字形表義**。例如「女」字；僅僅是一個女性的圖畫。這稱為象形字；注意在甲骨文中女字寫得非常象形。

(二) **通過聲音表義**。眾所周知，漢字沒有音標符號（phonetic symbols），但每個文字確實有一個聲音；例如「女」字的讀音是nǚ。我們沒有字用來寫第二人稱「你」這個概念。但在口語中，第二人稱讀為nǚ；在文字裡，已有「女」字讀作nǚ；因為兩者音同，「女」就被借用為代詞。這就是聲假字（phonetic borrowing）。秦以後，代詞nǚ寫作「汝」，以區別於「女」。

(三) **通過形音表義**。例如「姑」字，意謂「母親或婆婆」，由兩個部件組成，1.左側「女」指「女性」，原因顯而易見；2.右側「古」，本義是「古代」，這裡用作聲符，因為在口語中妻子稱呼她丈夫的母親為gu，音與「古」同。這就是形聲字。更準確地說，應該稱為「形聲合體字」（pictograph and phonetic-compound）。下文中將一直使用「形聲字」（phonetic-compound）來指這個意義。

中國文字有三種基本類型，同時，它們也表示中國文字發展的三個階段。通過對古文字的研究，一開始就很清楚，最初是象形字，最後是形聲字。這兩者之間的一類是聲假字。儘管聲假是從象形到形聲的過渡，聲假的方法在形聲產生之後還在使用；例如，某字A是象形字，因為讀音相同，而借用為B，則B為聲假字。B字加形旁，構成形聲字C，C與B字義相同。後來C因為與D音近，但意義無關，就用為D字。D跟A和B在意義上無關，但跟C音近，那麼D是一個新的聲假字。

下面的圖表來表示這些基本類型的發展：



由圖表可知，有些象形字一直是象形字，一些變為了聲假字，一些結合了其他成分變成了形聲字。形聲字也可以用來為聲假字。¹²⁵

¹²⁵ 譯者注：關於陳夢家「聲假字」的理論內涵，參王波濤：〈陳夢家「聲假字」及相關問題考辨〉《文獻語言學》第十輯（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5月）。

第三章 漢字的結構

第一節 象形

保留象形文字的原因要在漢語本身的性質之中尋找。下面分條闡明這一重要事實。

(一) 古漢語是單音節 (monosyllabic) 的非屈折語 (uninflected)。因為有極多的同音字 (homophones expression)，使用表音文字 (phonetic writing) 幾乎是不可能的。

(二) 漢語一直存在眾多方言；因此從古至今都不能使用表音文字。即便是一個方言之內也存在許多地方變體 (local variants)，如果使用表音文字的話，將會分化為不同的語言。而且，顯然保留象形文字是基於漢語性質的一種必然。

(三) 中國早期歷史上的特定政治影響，有利於加強這種自然演化。¹²⁶

儘管商和周原本來自不同的族群，但兩者非常接近，至少接近的程度足以使周完全采用商的書面語 (written language)。周代諸侯受制於中央，使用相同的文字。

隨著時間推移，語言發生若干演變趨勢，由此產生了特定風格的書面語：¹²⁷

(一) 經典的文言，指「文雅的語言」，從周代開始使用。「經典的」一詞就源於中國經書文獻的典型風格。1. 純文言。模仿舊式書面語，或用於文學寫作。儘管現在有些不常見了，但在碑文和非常嚴肅的場合仍在使用。現在高級政府文書是用這種風格寫的。2. 一種並非真正文言的風格，但保存了許多傳統經典的成分。用於撰寫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的文章，如史學、哲學、語文學。3. 第三種形式保留了舊風格中淺易的品質，應用於尺牘、電報、公告中。

(二) 口語的白話，指「平白的語言」，從唐宋，或許更早一點，開始使用。1. 純粹的白話，用來表現多樣的文學效果。例如從唐代文獻中能找到有一些，宋代僧人及宋儒語錄都使用白話。宋代以後的小說，在歐洲

¹²⁶ 譯者注：所謂「政治影響」，是指周代史官「掌達書名於四方」，以及秦始皇「書同文字」的政策。這些措施都有利於文字的規範和統一。

¹²⁷ 譯者注：以下討論文體風格、字形簡化、拼音化的部分是「甲編本」所無的。這些問題似與「象形」關係不密切。大概因為作者認為漢字是象形文字，故以「象形」代指整個漢字體系，來把這些一系列問題貫穿起來。下面「第二節字形」才是討論嚴格意義上的象形。

語言影響之前，已經是口語風格。2.歐化的白話（Europeanised colloquial）；由研究和撰寫有關西方學科的文章，而產生的一種「準漢語」（quasi-Chinese）。歐化的白話在一九一八年或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運動（New Culture Movement）之後開始使用。3.報章體（newspaper style）。是一種將口語和「淺白文言」的結合。新聞報道和社論使用這一風格。政黨的政治宣傳也使用這一風格。

（三）字形的簡化（Simplification）。複雜的文字寫成簡體（abbreviated form）。最先很可能是商業階層的職員為提高書寫效率而使用，後逐漸為知識階層所採納。簡化的歷史非常久遠。簡體常常取自於古體，偶爾也取自俗體、通用體。

（四）表音文字（Phonetic writing）。1.不同方言的羅馬化（romanisation），最先出自上世紀的傳教士。《聖經》翻譯，有時用作一種書面語。2.政府公布的注音字母（phonetic alphabet），是以標準語的官話方言為基礎。這是國語羅馬化的官方系統。3.第三種系統是用拉丁字母（Latin alphabet）標注不同方言。這是某些左派政治群體所使用的，比上面的官方系統發布的稍晚一點。

作為漢語書面語的基礎，象形文字已經使用了約三千五百多年，將來它是否會被改變，還未可知。¹²⁸中國是一個極為遼闊的國家，聚居著眾多不同口語、風俗、宗教的群體，都被共同的書面語這一特殊紐帶凝聚在一起。這種書寫形式是中國人團結統一的持久的象徵。

第二節 字形

我們已經指出漢字有三種基本類型：象形、聲假、形聲，但在所有漢字中，形聲字占絕大部分，其次是象形，而聲假字只占很小一部分。然而，每一個形聲字是由形符和聲符組成的，由此來看，象形字成為了占絕對多數的大類。例如漢賦裡，跟描寫山水相關的題目，選用形聲字來模山範水，這些字大都由與山水相關的形符組成，以致於文字本身就在讀者眼前呈現一種泉石景象。因

¹²⁸ 譯者注：一九五六年公布實施《漢字簡化方案》，一九五七年陳夢家在報刊上發表多篇文章呼籲慎重改革文字，〈略論文字學〉、〈慎重一點「改革」文字〉、〈關於漢字的前途〉，見《夢甲室存文》，頁235-251。

此，尤其在中國人的感覺中，形聲字仍然或多或少是一種象形字。今文字中有兩類字可以很容易地加以區分和解釋：第一類來源於古象形字，但在演化中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形，需要想像力輔助眼睛來理解其圖象意義。例如「犬」字，乍一看非常像一個站立男子的「大」形。然而，如果一旦獲得腦中冥想圖景的輔助，看到右上角的點是狗的耳朵，延長的捺畫是身體的一部分，這個字很快就會認出是個變形的狗的圖象。第二類沒有象形的來源，但這類字在熟貫之後常常獲得一個圖像價值（picture value）。例如「笑」字，用更理性的方法是考慮上半部，因為對中國人來說，部首「竹」，在這裡有「一對微笑的眼睛」的圖象價值，並不帶有竹子的意思。顯然，在嚴格意義上，這是個假象形字（pseudo-pictograph），儘管如此，它帶有其自身特定的圖象意義。上面兩個例子主要是想說明，象形字的表徵和景象是中國人的心理特質（psychologically Chinese qualities）。

似乎漢字的象形性質僅僅會創造一大堆名詞（substantives），但是由於缺乏形態屈折，一個字可以用為動詞、形容詞、副詞或小品詞等功能，通過句法關係表明其具體用法。例如在甲骨文中：

上帝的「帝」意謂「最高權力」或「最高神」；當帝字用在此例中，它顯然是個名詞。當「帝」位於介詞前，後面接一個祖先名，那麼「帝」是表「祭祀」義的動詞。當「帝」位於「史」字前（史謂史官或信使），那麼「帝」就有了形容詞的意義。「雨」字，象下雨之形，當位於形容詞「大」後，那麼「雨」是名詞。但位於否定詞「不」後，就有動詞的意義。「長」字，本象有長髮的人，用作形容詞「長的」，但也用作動詞「生長」。

因此，顯然象形字不限於名詞的意義，而是也可以表達動作，用來描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許慎分為三類的（一）指事（標示事務）；（二）象形（模仿圖畫）；（三）會意（拼合觀念），在班固的書中寫作（一）象事（模仿事務）；（二）象形（模仿圖畫）；（三）象意（模仿觀念）¹²⁹，班固把這三類歸為「象」，即「模仿」，因此表明了它們象形的基本性質，且「事務」、「觀念」本身就有動詞和形容詞的意義。

¹²⁹ 譯者注：英文本頁364拼寫仍然是 chih-shih, hsiang-hsin, hui-i，蓋誤也。

我們認為，在廣義上，象形字至少包括上述三類。象形字可以進一步分為六項（six sections），現在我們要逐個詳細討論。

（一）**簡單象形**（Simple pictograph）。此項稱為「簡單象形」是為了區別於「複雜象形」¹³⁰。簡單象形是摹寫事物的「簡筆畫」，例如「日」、「月」。它們以各種方式成為下面五項文字的成分（elements）。

（二）**抽象作用**（Generalization）。這類象形字能表達某些物象的抽象義；即是說，這種文字摹寫的圖畫是眾多事物所含的一種共有屬性。例如，一、二、三、三，寫作平行的筆畫。可以表示木頭、石塊、玉石等等任何事物的數量。如「小」字，本象沙粒，可以用來表示血點、雨點、肉汁點等等微小東西的概念。如「上」、「下」，原本以容器水平面為基點，表示某物在上或某物在下。這些都是甲骨文中的例子。

（三）**簡化作用**（Simplification）。此類象形字是由繁複精微的字形簡化而來。下面的例子分為四列。第一列取自早期青銅器，第二列取自甲骨文，第三列取自周代青銅器，第四列取自《說文》。¹³¹按照年代早晚的順序排列，應該是甲骨文，早期青銅器，周代青銅器，《說文》。早期青銅器極有可能跟甲骨文同時，但也可能稍早或稍晚。即便時代稍晚，但其字形仍然要早於甲骨文中的字形。早期青銅器的這些文字收錄在《金文編》附錄第一部分，及《殷文存》、《續殷文存》。只要稍一檢視這些字形，就能看出它們非常近似於圖畫。它們大都是族氏名。因為族氏名在書寫時具有字形的保守性，使舊字形得以保留很長時間。同一字的簡化字形有時見於甲骨文，這意味著金文的字形有比甲骨文更早的字形來源。因為有些字在甲骨文中不是作為族氏名，就易於寫成簡化的字形，但青銅器銘文保持了較早的字形。從書寫或從書寫材質的角度看，甲骨文刻寫很快，不能刪除和改正，整個作品都有一種倉促為之的面貌。青銅器用於嚴肅場合，鑄在器上的銘文，先在模範上經過精心修飾和更正，因此有機會使用這種類型的文字。所以同一個字，儘管甲骨文刻寫的時間要稍早，但甲骨文的字形要比青銅器上的簡化。同一個字，鑄造在青銅器上，時間雖比甲骨文晚，卻保留了較古的字形。¹³²列在第一列的舊字形，儘管實際時代較晚，卻可

¹³⁰ 譯者注：「複雜象形」在書中沒有定義，可能是指跟「簡筆畫」式的簡單象形相對的，描摹更為細緻逼真的字。









¹³¹ 譯者注：英文本例子缺失，僅存其描述。可參看「甲編本」，頁32-35。關於陳夢家書中所引古文字資料的校訂，可參看許淑萍：《陳夢家〈中國文字學〉（修訂本）古文字材料校訂》（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

¹³² 譯者注：裘錫圭說：「我們可以把甲骨文看作當時的一種比較特殊的俗體字，而金文大體上可以看作當時的正體字。所謂正體就是在比較鄭重的場合使用的正規字體，所謂俗體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較簡便的

視為更早的字形。


在漢字演變過程中最重要的發展趨勢是簡化。除了《史籀篇》中的少數文字，這一發展趨勢是普遍的。字形上的簡化，文字數量的增加，文字的持續複合，是漢字形體演化中的三個普遍趨勢。由於漢字的這種自然演變，不同時代使用了多種不同的字體名稱。此外，字體變遷還受到了書寫材料的影響。

（四）**分化作用（Reduction）**。此類象形字是由整個字分化而來，文字的部件，有些部分保留下來，有些部分省略掉了。可分為三型：

1. 分化為一半，即把字切為相等的兩部分，省略其中的一半。一般出現在對稱結構的文字中。（行→彳；→〔郭〕；→）
2. 文字切分為幾個部分，書寫時省去其中一部分，例如象人執兩個兵器之形的字，將人省去，分化為兩個兵器。象人手持物的字，大多數情況下是分化為手持物。（→）
3. 本來是象形複合的字，分化為分離的，但沒有將某部分省略掉。（→）

上列諸字，許慎多歸為形聲或會意，因為他不能追溯到足夠久遠的象形字形，看到它們實際上是這三種分化之一。





（五）**指示作用（Indicative）**。此類象形字是創造一種強調效果。可分為三型：

1. 通過添加成分來強調，或用一種特殊的方法強調一部分。例如，「刃」謂「刀的邊緣」，在左側加一點，來指出在刀的鋒刃。這個點有（二）抽象作用的功能，它表達的是一塊肉或一滴血在刀的刃部，這種結合就是指示作用。「企」字故意寫出人的腳，表示某人「踮起腳尋找或觀望什麼」。
2. 通過省略來創造強調。「子」本來是小孩舉起雙臂之形。當同一字寫的沒有臂的「了」，意思是「沒有胳膊」。「木」字是「一棵完整的樹」，但當把木的頭砍掉，就剩下了¹³³（杝的古文，《說文》卷六上）意謂「樹的頂部」。

字體。……在金文裡，記名金文的象形程度通常顯著地高於記事的一般金文。後者大多數見於商代後期的晚期銅器上，字形跟晚期甲骨文相似。記名金文不管是見於早期銅器的，還是見於晚期銅器的，通常都比早期甲骨文還象形。」《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48。

¹³³ 譯者注：英文本作「木」，今正。

3. 通過改變位置來強調。例如「大」字本來是君子之形，當顛倒為「𡗗」（這是甲骨文的字形，後來加了「辵」旁，變成現在的「逆」。）謂「顛倒、反轉」（注：即「跟自然的方向相反」。魚鱗的方向從頭到尾是順的，從尾到頭是逆的。）「人」字寫作顛倒的「𡗗」表示「變化、改變」，引申為「死亡」。《說文》中「𡗗」見於兩處，一是卷八上的部首，謂「變化」，二是卷四下，「殄」字的古文，謂「死亡」。

在文字書寫趨於穩固化（*stabilization*）的強烈趨勢是漫長演變的結果。早先一個由多個部件複合而成的字，每個部件的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可改變的。後來，部首常置於一個字的左側或上面。同樣是在商代，某些字已經不能改換位置了，例如，（上，下），和，（左，右）。這些字是不可改換的。

為說明這類「不可改換」（*not changeable*）文字的發展，我們可以梳理甲骨文和金文中從人形演化而來的字；其用法和穩固化在下表中看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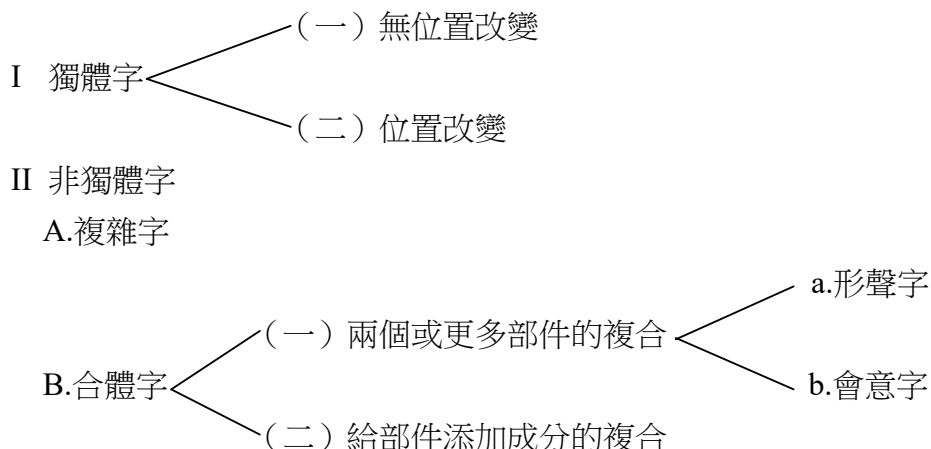
這些字單獨寫時，人形可以朝左，也可以朝右，我們認為，祇有成對的人形才會朝向同一方向，或朝左，或朝右。下表中的「左、右」表示大多數朝向，後來朝向漸趨於標準化（*standardized*）。¹³⁴

甲骨文		金文	
左右無別	左	右	左
𡗗 <small>𡗗字古字，「女性先祖」</small>	人	𡗗	人
𡗗 <small>女性先祖</small>	眾 <small>「一群人」</small>	𡗗	
比 <small>「跟從」「聯合」</small>		比	
從 <small>「跟從」</small>			從，眾
旅 <small>「旗子下一群人」</small>			旅

應該注意的是表中的幾組字，人朝向右的跟語音bi，pi相關，人朝向左的跟語音cong，zhong相關。

（六）會意作用（*Assembly of ideas*）。前面幾項已經闡明，象形字本身是一個單位，在此單位上可增加部件，或者改換其位置。本項的象形字是那些將兩個或更多單位複合而成的。上述漢字的關係可以圖示如下：

¹³⁴ 譯者注：此表是甲編本頁42表的簡化。



現在要對這幾組加以詳細討論。

II-A組可以稱為「複雜象形」(complex pictograph)；在理論上，這一組字是較早字形，並沒有經過簡化和抽象等演變。這組字即表三¹³⁵的第一列。I (一)是指原本簡單的象形字，或簡化後的象形字。I (二)和I (一)相同，但位置發生了改變；這在「指示作用」最後部分討論過了。II-B (二)是「指示作用」的前兩類。II-B (一)是許慎定義為「形聲相益」的「字」。II-B (一)中a和b的區別很明顯，但正如前面提到的，b的其中一個部件可能用為聲符¹³⁶。在這種情況下，a和b在形式上沒有區別。

II-B (一) b會意字很容易理解。它分為兩部分：1.不同部件的複合，2.同一部件的重複。1.的例子如「明」，是日月的結合。組成成分的性質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通過重複「光明」的性質來表達這個意思。「鳴」是口和鳥的組合，這兩個部件相互修飾，限定了意義。鳥的部分表明其類型不是動物不是人類也不是其他的什麼，而是鳥，口的部分具體化了鳥的部位和動作，因此意義是「鳴叫、歌唱」。2.的例子如：「林」字是「木」的重複；「羴」形象地展現了三隻羊的複合；「集(隳)」上是「隹」的重複，意思是「一群鳥」，引申為「聚集」；「從」字的意思是「跟從」，是把朝同一方向的兩個人加以複合，這是簡單重複的例子。

必須注意下面兩點：第一，不同部件的複合應該非常小心地跟複雜象形區別開。複雜象形或多或少是一個實際的圖畫，但上述五項中的許多字是人為設計的複合，儘管原本取自象形字。第二，指示字是通過強調文字的某一部分來把特殊意義表示清楚的，只有當這個字能自己說明自己，此特殊意義纔能保留

¹³⁵ 譯者注：英文本無「表三」，按應指前文「(三) 簡化作用」的第一列象形程度高的早期金文。

¹³⁶ 譯者注：會意字中兼有表聲的部件，指亦聲字。

下來。只要這個字成為複合的一部分，其特殊意義很快就消失；例如「企」跟「人」不同，因為它強調腳的部分，但金文中有合體字，從「企」與從「人」意義無別。部件的重複與否也是一樣的。如前面所說「木」字重複組合為「林」，這就有了不同的意義，即一棵樹和一片樹林的區別。然而，如果「林」和另一成分複合為「楚」字，在金文中「楚」字從一個木或兩個木，意義無別。

綜上所述，關於象形字基本作用的認知，可以歸納如下：I.圖畫；II.複雜象形字；III.象形字。

象形字可分為六組，組中又可以繼續細分。

1. 簡單象形
2. 抽象作用
3. 簡化作用
4. 分化作用
 - a. 刪去字的一半
 - b. 把字分為幾部分，寫時省去一部分
 - c. 分散開，沒有省略
5. 指示作用
 - a. 用添加來強調
 - b. 用省略來強調
 - c. 用改變位置來強調
6. 會意作用
 - a. 不同部件的複合
 - b. 同一部件的重複

上述各類象形字的發展，又可以分別歸屬於下面這三個題目之下。

1. 簡化——1, 2, 4a/b, 5b.
2. 添加——5a, 6a.
3. 如舊——4c, 5c.

從最後這個三個題目可以看出，大多數象形字歸入了「簡化」這個題目之下。因此，顯然存有一種使字形變得越來越簡單的緩慢趨勢。

第三節 語音

古漢語語音的擬測現在才剛剛起步。古音擬測以《詩經》韻腳和隋唐韻書為基礎，時代限於東周和西元六世紀之間。東周以前的押韻材料不可得，剩下唯一合理程序是通過聲假字和形聲字來研究語音。我們相信深入研究此期的古文字，對恢復東周以前的古音系統大有裨益，但嘗試重建商和西周時期的語音系統似乎為時尚早。

早期書面語和口語的關係非常近，有三條有力證據可以說明：第一，句法上，即便現代口語與銘文語言的語序仍有基本相似性，由此可以推測在商周時期言、文的統一性會更近。第二，只有言、文關係非常密切，聲假字才可能發生。第三，相同的原因很可能同樣適用於形聲字的產生。材料上反映出商周時代書寫困難，正如我們已強調的，於是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趨勢使書面語盡可能地簡單。西周時期，由於貴族們都來自王室，文字由史官發出，且由貴族使用，所以能保持統一性。東周時，由於中央權力的衰弱及疆域的擴展，加速和強化了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不同。秦以後，言、文的不同加劇並分裂，後來作家強調模仿古代的語言。言、文的分離一直持續到近年，「白話」的發展重新把兩者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即便是從周到現代這麼長的時期裡，漢語口語的語音一定發生了許多變化，但仍然可以用現代語音讀《詩經》，並保持韻式。我們推測在語音的演變中沒有發生徹底的改變。

記錄漢語口語的單音節文字極有可能在商代就確立了。由於沒有材料，我們不會討論商代以前的語音。通過研究上古時期的銘刻，我們瞭解到關於語音和象形字之間的一些特殊現象。

（一）字形替換（The substitution of forms）。¹³⁷僅僅因為字形的相似性，有些形、音、義都不同的字可以相互通轉。下面是甲骨文和金文的例子：

「大」，象人之形。

「天」，象人之形而突出其頭部，省略了頭就是「大」。

「夫」，象人之形而頭部有簪。

「立」，象人立於地面之形。

¹³⁷ 譯者注：甲編本作「形近通轉」，頁47。

正如上面所說，這四個字可以相互通轉。

甲骨文中，「大邑商」有時寫作「天邑商」。《尚書·多士篇》作「天邑商」。


甲骨文中，商祖先「大戊」，也寫作「天戊」。商祖先「大乙」在《史記》中作「天乙」。此外，甲骨文中王名「大甲」，偶爾寫作「夫甲」。

西周青銅器中職官名「善夫」，可以寫作「善大」或「善夫」。

東周青銅器中，秦公鐘裡一個器上的「立」字，在另一器上替換為「天」字。吳王「夫差」，在有些青銅器上也寫作「大差」。

戰國青銅器和其他古器物上，「大夫」常寫作「夫=」或「大=」。¹³⁸注意第二字沒有寫出來而是寫作重文符號。在這些例子中，「夫夫」和「大大」都讀作「大夫」。

顯然，這些字單獨使用時是有區別的，但這些字成為詞語的一部分，用在人名、官名、地名中，就可以相互替換。之所以能夠相互通轉主要是由於這四個象形字的字形非常相似，而字音（儘管不同）的重要性就放在了字形和字義之後。

（二）同源分化的異形異音字。¹³⁹如：「母」和「女」在甲骨文中都寫作「女」。後來「母」通過添加兩點來區別於「女」。許慎誤認為這兩個點代表乳頭。後面章節會討論這個細節¹⁴⁰。「月」和「夕」同為新月之形 。後來加了一點來表示兩者的區別。「兄」和「祝」同為突出口的人形，或者口覆蓋了頭。後來表示「祈禱」義的字通過添加部首「示」以相區別，表示跟祭祀儀式有關。「人」和「匕」同象人形。在甲骨文中，這兩個字沒有區別，後來兩字通過位置不同而相區別。正如前面指出的，「從」和「比」的關係也是一樣的。

通過給同源字加點，加部首，位置特殊化，就分化出異音異義的字。這表明，在同一時期內相同的象形字，可以表達不同的意義，而且有不同的讀音。因此在青銅器中，象人肩負劍、戈之形的複雜象形字，會有三種可能的讀法：

1. 「伐」、2. 「戌」、3. 「何」，現在寫作「荷」。

¹³⁸ 譯者注：英文本作「大大」，根據下文應作「大=」，頁378。

¹³⁹ 譯者注：甲編本作「同字異讀，由一文分衍為數字」，頁48。

¹⁴⁰ 譯者注：下章未寫出。從陳夢家文字學理論看，女加點為母，是「形指字」，屬於「用指標來限制意義」「普通名詞限制為比較名詞」。《中國文字學》，頁89-90。陳劍：「眾所周知，『女』、『母』、『毋』本一字之分化，（前二者是『一形多用』的關係）。『女』旁中間『乘隙加點』添加裝飾性筆畫即成『母』形（流行最廣的所謂『母』中兩點『象乳房之形』云云，實不可信），從殷墟甲骨文一直到戰國文字，都是長期存在的普遍性現象。」〈釋金文「毒」字〉，《中國文字》二〇二〇年夏季號（總第三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0年6月），頁210。

(三)¹⁴¹表示一百和一千的字，現在讀作「百」和「千」。在甲骨文中「百」是兩部件的合文（combination）：上部是數字「一」，下部的字讀作「bai」，本義不得而知，但這裡假借為數字名。合文的結果是，這個字應該讀為「一百」，但是卻讀為「百」。甲骨文中數目五百寫作「五」和「百」的合文，明顯是「五一百」，但實際讀為「五百」。此外，一千、三千和五千，甲骨文中的字形都是一、三、五跟「人」的合文。這裡「人」是個聲假字讀作「千」，因此表示一千的字應該讀為「一千」，但現在僅讀為「qian」。原本的讀法可能讀為多音節而不是單音節，後來發生了分化，最終較早的多音節變為單音節，現在寫作一個字形，讀作單音節。

東周青銅器和《說文》中，有一個字是「半」和「斗」的合文，意思是「半斗」。據許慎的注，顯然他認為這是個「會意字」，但同時他說「半」是聲符。這個合文有時也寫作「半」，正如在《史記·項羽本紀》和《漢書·項羽傳》《李陵傳》中那樣。「半」字又是「八」和「牛」的複合，本義是「一半牛」。「半」可能從「八」得聲。

通過這些例子我們發現，現在認為是一個字的，原本可能是幾個字的合文；此外，如「伍」，可能早期是「人」和「五」的合文；「駟」可能原本是「四」和「馬」的合文。

我們所謂「合文」，是將幾個字拼合到一起產生一個單字，或變為單字的形式。這個合文可能保持作為單字的單音節讀音，或可以保持分開部分的讀音。前者由於結合，往往變為單字；後者往往還原成它的組成部分。如果想表達一個更複雜的想法，例如「十加二月」，使用短語「十又二月」，或省略「又」為「十二月」。在這個情況下，表示「十二月」的短語有三或四個單音節讀音。上面，「百」「千」是兩個字複合的結果，但卻讀作單音節。在甲骨文中，短語「十二月」寫作單字形「𠂔」，可能是因為它不能讀為單音節，最終在西周青銅器中，使用短語「十又二月」或「十二月」而不是合文。由此，可以合理推測，早期嘗試性使用的合文，在後來有可能消失。儘管我們反復指出漢字發展的強烈趨勢是趨於簡化，但這種類型的合文和之後的拆散，成為一個例外。在我們看來，研究漢字和古文字學時，應該尋找到普遍原則，並且對例外要加以注意。例外的情況常常不是妨礙通例，而是使通例更為清晰。

從古代銘文的例子中，可以確定至少有六類合文。

¹⁴¹ 譯者注：「甲編本」此節標題為「丙、合文」，頁49。

1. **數字的合文**。上面給出的「百」和「千」都是這個類型。在甲骨文和西周青銅器上，有時十的倍數也書作一個字。

2. **名詞和形容詞的合文**。甲骨文中「小」字可以和「隹」、「王」、「臣」等複合。西周青銅器中，我們發現「小」可以和「子」、「臣」、「牛」複合。甲骨文和金文都有「上」和「帝」的複合。在西周青銅器中，我們發現𠂔（彤），或和「弓」，或和「矢」複合。除了「小」和「隹」的複合之外，這些合文後來都消失了。

3. **名詞加……的複合**。如果能分清，這一類型可能屬於類型2。另立一個標題是為了避免歧義。「牝」和「牡」都是「牛」和其他部件的合文。現在的意思是「公或母的動物」，儘管它們的部首看起來都是「牛」。現在常寫作「牝」的部分，在甲骨文中是不固定的，有時寫作「馬」，或作「豕」，或作「羊」。部件「匕」在甲骨文中謂「女性」，和「牛」複合，謂「雌性動物」，和英語中「she-goat」（母羊）相似。「牡」字中的一個部件是陰莖之形，顯然表示「男性」。

「物」字現在的意思是「東西」，本義是用於祭祀的雜色牛。這個字是「牛」和「勿」的合文。「勿」可以讀作「犁」，象犁口附著泥土之形。「物」字的部件「勿」引申為「犁」的意思；因為泥土附著在犁口上，變得不乾淨，它被泥土弄斑駁了。

4. **反義詞複合**。¹⁴²「下」、「上」兩字的合文是𠂔。商代人寫「下上」，而不是更常見的「上下」，「上下」是周人的用法，西周金文寫作𠂔，它本身是一個合文。有趣的是《詩經·衛風》還有「下上」的用法，衛是商的故地。

牝，是甲骨文中發現的一個古怪的字，它是類型3中雄雌的複合。因為這個字不見於別處，其讀音已經遺失。¹⁴³

在西周金文中，「小」和「大」複合為一字。應該注意它跟「尖」字無關，「尖」是漢代以後才造的一個俗字。同樣的，𠂔跟現在的「卡」字也沒有關係。在金文中，「上-下」「小-大」還都讀為分開的兩個單音節字，且原來的意思也不變。現代的合文「尖」和「卡」，除意義上沒關係外，聲音上也沒關係。

¹⁴² 譯者注：甲編本作「相反的兩個文的複合」，頁53。

¹⁴³ 譯者注：字見《前》1.33.7（《合》19987），裘錫圭認為是「合文重複偏傍的省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頁87-88。對於此條卜辭讀法，他說：「『牝』顯然是『牝』、『牡』二字的合文。對於『二牝』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二牝二牡』，一種是『二牛，一牝一牡』。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在這句話裡都有必不可少的字沒有寫出來。也可能寫卜辭的人是直接以『二牝』來代替『一牝一牡』的。那就跟文字與語言相對應的原則離得更遠了。此外，不管怎樣解釋，在這句話裡，『牝』、『牡』這兩個詞都不是直接相連的，但是寫卜辭的人卻把它們合寫成一個『牝』字。從這個角度來看，『二牝』也是文字排列不合語序的一個例子。」《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四卷，頁37。

5. **專名和通名的合文**。一般來說，河名和山名是由通名和專名組合而成，後來形成一個單字，以通名「水」和「山」為部首。氏族名總是複合「女」，表明這些字有可能也是合文。

6. **廟號的複合**。在甲骨文中，給死者的廟號大多數寫作一個簡單的字。商王室有個習慣，就是從「天干」中選一個字給祖先命名。這些字也是日名，即是說，它標記在那一天祭祀，就用此日名命名某位祖先。祖先的地位也常常由日名的先後順序來表明。因為天干只有有限的十¹⁴⁴個字，所以祖先名常有重複。因此，在名字前面加一些字區別同日名人的不同地位。在西周金文中，「文王」或「武王」有時複合為單字，作「玟」、「珽」。

由上可知，上述合文常見於甲骨文和西周早期金文中。且這些合文大都歸入上列六類中。現總結如下：

- (一) 數量、數字。
- (二) 某種動物、物品。
- (三) 地名、人名、族氏、職官名、神名等專名。

這三種類別專門由各種名詞組成。「上一下」和「小一大」都屬於這一組，儘管「小一大」是形容詞，但在漢語中具有名詞的功能，意為「大的和小的」。

我們已經指出「合文」是簡化演變的例外，但必須瞭解，這些合文表示一個概念單位，而不是形體單位或語音單位。然而，由於合文跟基於口語的單音節文字和一字一讀相矛盾，這種類型的合文消失了，那些保留下來的遵從了單音節化的一般規律。西周晚期的石鼓文，寫成四言的韻語。有一個句子只有三個字，其中一個字是三十的合文「卅」，表明在那時「卅」必須讀為一個以上的音節。石鼓是秦國的作品；後來秦始皇帝時的石刻銘文中也是寫作四言的韻語，有一個二十的合文「廿」，但現在卻讀為單音節。形聲字中有一部分來自合文；這些字後面還會說到。

這裡我們不打算討論複輔音的問題。因為材料貧乏，證據薄弱。有跡象表明這種複輔音主要是聲母加流音。歷史音韻學的研究和中國民族語的研究，可能最終幫助這個問題的解決。¹⁴⁵古文字學的責任是指出在本領域內出現的這類問題，但要交給音韻學家去解釋。

¹⁴⁴ 譯者注：頁386原作「十二」，今正。

¹⁴⁵ 譯者注：參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南京：中研院史語所，1944年），頁12-13。

第四節 意義

表示「意義」的漢字有兩個，「意」和「義」，發音都是yi。許慎《說文·敘》用「誼」代替「義」，從鄭玄注《周禮·肆師》可知，漢代誼、義通用。儘管現在「意」和「義」複合為「意義」一詞，但它們本來代表兩個不同的概念（notions）。「意」字從「心」，用來表示「內在的意義」或某人心目中一個事物的「品性」，而「義」字用來表示事物外在的或「表面意義」。如果把此觀點應用到六項象形字，顯然只有簡單象形和複雜象形表達的意義是「義」，而剩下的五個是「意」。需要指出的是，傳統術語稱第一類為「象形」，其餘為「象意」。

前面把所有文字分為象形、聲假、形聲等三種，由於它們使用不同方式來表達意義，現在可以對它們有更清楚地理解。象形使用圖畫原則，聲假使用聲音，形聲同時使用聲音和圖畫。

對聲假字研究非常依賴上古音，這是語音學家的職責，而不是古文字學家的。形聲字中那些聲旁相同而部首不同的字，給上古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但是「諧聲」嚴格說是語言學家的專業領域。在我們的領域裡，將討論引申和同義。

（一）引申義（Extension）。一個字的意義是靈活的，甚至句法使用有小變化時，意義的差別也是細微的。一個簡單的字，在用法上和意義上可能有非常長久的歷史演變。「何」字（本象人肩負武器之形），在金文中是一個人名。秦代以後成為一個興盛的族氏名。早在周代，「何」就被假借為疑問詞「為什麼」，後來造「荷」字作荷花名，但因為「何」後來只用作疑問詞和姓氏，形聲字「荷」假借為表示「負擔」義的動詞和形容詞。字典中幾乎任意一個字，都會有一個長久的演變歷史。詞義引申可以分為三類：

（二）意義引申，且詞性變更。「令」，即「命令」變為「發命令的人」、「長官」。「長」，本是「長髮」變為「長官」。

（三）意義引申，但詞性不變。「降」在甲骨文中象人從山上下來，引申為任何事物從上向下。「天」本象人頭，變為「凡在上者」，因而表示「在上面」和「天空」。

（四）保持名詞義，引申出動詞義。「日」，「太陽」變為「每日」。「止」象「腳趾」形，變為「停止」。

必須指出，漢語中的「詞性」只有當一個字放在句子中賦予了句法功能纔有意義。跟其他多數語言不同，漢字單獨出現時，沒有明確的詞性意義。只有

句法功能改變了詞性，（一）和（二）才有明顯的不同。此外，如果同一個字有兩種不同的詞性功能，可以通過聲調的變化或發音中的微小差別來表現。儘管我們可以觀察語言中聲調和韻母的事實，但上古漢語中的這類變化，建立在諸多假設之上，否則就不能解釋。我們只能推測意義變化與聲調變化有關聯。

考慮到漢語的聲音、意義和來源，同義字（synonyms）至少可以分為如下幾類：

（一）聲音不同者。《爾雅》前兩章，通過意義把同義字彙聚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爾雅》前兩章並不是嚴密的同義字，而僅僅是很大程度上相近，第一組同義字都跟「始」相關。我們僅能指出的事實：1.通過引申，某些文字具有了相似意義，2.不同文字在不同時代的用法有相似意義，3.不同文字在不同方言中有相似意義；所有這些傾向於把原本不同的文字作為同義字。

（二）聲音相同或相近。此情況下，當文字意義相似且其聲音相近或相同，可以有兩種解釋：1.這組字中有一個字因形表意，其他字是前者的聲假，或前者同義字的聲假。應該注意到，聲假並非專門是為了那些沒有字來表達某個意義而產生的，而更多的是作者的喜好，或因為記憶失誤，不得已使用一個在聲音和意義上都相似的同義詞。2.一組字中沒有一個是因形表意的，或者說全部是同義字的聲假；這需要上古音的知識來研究這一領域。

（三）形聲字的形旁可以由另外一個意義相近的形旁來替換。¹⁴⁶同樣的，聲旁也可以由另外一個聲音相近的聲旁來替換。因此兩個字可能在形旁和聲旁上非常不同，但複合之後卻是同義的。下面將討論這種類型的替換。

第五節 形聲

許慎說「當圖形和聲音結合起來，就稱為字」。從廣義上講，（一）形和聲的結合；（二）形和形的結合；（三）聲和聲的結合，這種三種文字都可以定義為「字」。但許慎認為的意義可能更狹隘，只關注到形和聲的結合。根據許慎的定義，「文」是「依類象形」，其中就包含了複雜象形和簡單象形，象形字所模仿的事物是在文字創造之先就存在的。這些「文」後來變成了用來複合為「字」的單位。「字」是依照邏輯可能的想法複合而成的。前面討論「意義」時說過有兩種意義，內在的意義和表面的意義；我們用這種區別來說，「字」跟「內在的」相關，「文」跟「表面的」相關。

¹⁴⁶ 譯者注：即所謂「義近形旁通用」。

對上面給出的三種類型的「字」，通常使用的術語是（一）形聲，（二）會意，（三）假借（有一個增益的聲旁）。會意已經討論了，既然假借這種類型可以歸入到形聲中，我們將詳細討論這個分類。¹⁴⁷

正如我們所知，文字通常的發展是以象形為開始，形聲為結束。¹⁴⁸我們將探討這兩種類型之間演化的複雜現象，為什麼文字開始向形聲方向發展，為什麼變成形聲之後演變就終止了。在此運動中，存在著形與聲的巨大鬥爭，儘管最終它們相互妥協，但「形」始終居於主導地位。這裡要指出的是，從象形到形聲的重要轉化，跟之前分析的三個方面相一致，即：第一，形體的變化，第二，聲音的假借，第三，意義的引申。¹⁴⁹

形體的變化遵從兩個原則。（一）簡化的驅動力使筆畫盡可能簡單。（二）受書寫材料和工具的限制。結果造成今文字越來越不象形了；例如「春」「奉」「秦」「泰」現在看來屬於同一部首，但如果追溯到它們的古文字形體，可以看出它們來自四個不同的字形。今文字中，「月」和「肉」單獨寫時不同，但當後者寫在合體字中，其形體就跟「月」一模一樣。這些混淆是象形字的不足，但幸運的是這種情況並不普遍。

聲音的假借給象形字命運帶來巨大危險。為什麼表音文字不能將象形字替換掉的原因前面已經論述過。¹⁵⁰不管過去還是現在，聲假的運用是必要的，例如書寫者沒有新字可用，或者忘記了某個字的確切寫法，這時候就需要聲假。聲假只能暫時使用，因為如果同一個字被假借為許多用法，將會造成混淆。為清晰區別起見，就有一種對此加以限制的自然傾向。增益形旁或部首來使新意義清晰明白。從意義引申的角度看，如果一個字有多種不同的用法，同樣會造成歧異。因此也很自然地需要增益形或聲，來對新字的新意義加以限制。由此可知，聲音的假借和意義的引申是象形字自由隨意使用的結果。最終會造成意義混淆。澄清和恢復秩序是通過添加形旁（form-elements）和聲旁（phonetic-elements）來實現的。就是在這些情況下，形聲字逐漸製造出來。前面說的原因，再加上分類範疇的增加，方言，哲學術語的發展等其他原因，自然造成形聲字的增加。

¹⁴⁷ 譯者注：陳氏關於廣義形聲字的分類見《文字學甲編》，頁66。

¹⁴⁸ 譯者注：頁393，作「begins with the pictograph and the phonetic-compound」此句表述有誤，按照陳氏的理論，應該是以象形為始，以形聲為終。頁355-356作「the pictograph is first and the phonetic-compound is last」，據此文義改。

¹⁴⁹ 譯者注：亦見於「甲編本」第二章，五〈文字的基本類型〉，批注，頁24。又見於「重訂本」第二章，第三節〈文名字與形音義〉，頁256。

¹⁵⁰ 譯者注：英文本頁394此句衍「in toto」。

大多數文字歸入到了形聲這一類。後來，形聲字成為表達意義最方便的方法，凡有新事物的出現，就用形聲來製造新字。顯然，在形聲時代確立之前的那個階段，形聲字的增加必定是出於種種不同原因的。¹⁵¹

譯後記

一 英文本《中國古文字學導論》的寫作背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文學院開學。本學年度，陳夢家任清華大學教員，在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中國文學系授課課程：文字學。」¹⁵²這是陳夢家教授文字學之始。一年後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日，陳夢家向胡適求助，希望他能幫助自己留學美國。這主要基於他在學術方法上企圖突破傳統的一種內在的強烈要求。他給胡適的信中說，研究古代文化，對於乾嘉以來的學問，「今日則不但是繼承之，而是發展為新的。」，「此類學問不是不增加價值，而是不變新不創造。我嘗想及此，總想對於典籍材料稍稍涉獵後，要注意訓練自己的新方法，新態度，而研究古代文化，西洋的考古學、人類學，尤為急需。因此，老願意有機會出國一次。」其次，陳夢家的妻子趙蘿蕤在燕京、清華兩所大學學習和研究西方語言文學，造詣在陳氏之上，她也有遊美之志。陳夢家又自述「至於我的英文，看書可無問題，也可以普通會話。」¹⁵³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在金岳霖為陳夢家謀求去美訪學的信函中，介紹陳氏訪學的目的：「以便自己更多地瞭解美國及其他國家在其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同時學習更多地技術和方法。」¹⁵⁴在金岳霖的介紹下，陳夢家夫婦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抵達美國芝加哥大學。從動念留美，到實際成行，過了六年時間。在芝大，兩人「都兼職教學工作。陳夢家主持中國古文字學討論課，趙蘿蕤負責中文口語課程。由於他們延遲抵達，大學行政部門將其停留時間延期至夏季學期，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結束。」¹⁵⁵趙蘿蕤回憶陳夢家的古文字學課說：

¹⁵¹ 譯者注：形聲時代確立之前的階段，形聲字產生的途徑是多樣的，如象形字增加聲符，假借字增加形符，或有形符聲符組合為新字等等。

¹⁵² 子儀：《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106。

¹⁵³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35冊，頁514-517（轉引自子儀：《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頁121-123）。

¹⁵⁴ 潘思婷撰，曹菁菁、田天、王睿譯：〈陳夢家：中國銅器，西方收藏，國際視野〉，《中國銅器綜述》（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377。

¹⁵⁵ 潘思婷：〈陳夢家：中國銅器，西方收藏，國際視野〉，《中國銅器綜述》，頁378。

「選讀他這門課的美國學生聊聊無幾，只四五人。」¹⁵⁶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在陳夢家給胡適的信中說：「今年六月以前的工作由我和蘿蕤合作教書與研究。」二月十七日，致胡適信說：「現在我在此地的工作非常清閑，下學期（正月二日起）只教一門文字學，其它自己研究，……我自己想要做的事大致有三項：一把我的文字學講義改編成一本英文的課本；二把我研究上古史（偏重金文、《尚書》和古年代的）寫成一個英文本；三看一看所有在美國的古銅器，作詳盡的記錄和考訂。……我的文字學講義是用白話寫的，教過七次，改過三、四次，因為總不能滿意和印刷的困難，一直沒有印過，到此地後看了許多外國學者所寫的關於此類的書，覺得很需要一本簡單而新的文字學導論，現在打算先做它，對於治漢學的外國學者，或者有一點利益。」¹⁵⁷

由上可知，一九四四年剛到芝大任教時，使用的講義還是之前白話寫的文字學講義。「教過七次」當是指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四年，每年開一次課。「改過三四次」指一九三九年夏寫成《文字學甲編》前六章，一九四二年四月續作第七章，一九四三年做「重訂本」《中國文字學》兩章。¹⁵⁸

陳夢家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將講義「改編」為英文本，這裡應得到趙蘿蕤的幫助。因為在教學和研究上，夫婦二人是合作關係。編寫英文本的目的是對外國的漢學家有所利益，這本書的定位是：「簡單而新的文字學導論」。陳夢家從一九四五年二月開始著手改編英文本，到這年七月份，隨著他在芝大古文字學課接近尾聲，開始全面轉向調查和研究美國所藏青銅器的工作，文字學導論改編工作遂寢。該書僅完成三章，是一部未完稿。

潘思婷介紹了中國社會科學考古所藏英文本的情況，「考古所保存了陳夢家題為《中國文字學概述》的講義，有兩個副本。這些資料很明顯是他文字學教材的初稿。講義包括兩個主要部分，歷史調查和結構，每一部分又細分若干章節。每份手稿（共一百一十二頁）都有他的一個學生的手寫注釋。」¹⁵⁹就是後來收入二〇〇六年「陳夢家著作集」《中國文字學》一書裡的第三種。¹⁶⁰

¹⁵⁶ 趙蘿蕤：〈憶夢家〉，《新文學史料》第3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145。

¹⁵⁷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5冊，頁522，頁518。（轉引自子儀：《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頁182-185）。

¹⁵⁸ 子儀：《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頁129，頁154，頁167。

¹⁵⁹ 潘思婷：〈陳夢家：中國銅器，西方收藏，國際視野〉，《中國銅器綜述》，頁380-381。

¹⁶⁰ 著作集《出版後記》說「譯成中文為『中國古文獻概要』」。曹菁菁等將書名譯為「中國文字學概述」。陳夢家在致胡適的信中說是「文字學導論」。今按：唐蘭先有《古文字學導論》一書，陳夢家的書名可能參考了唐蘭的書名。introduction 譯為導論；因為是給外國讀者寫的，加 Chinese 以別之；palaeography 的詞源是希臘語{古老}{文字}兩詞的組合，即古文字。故書名當直譯為「中國古文字學導論」。

二 英文本《中國古文字學導論》的編寫特點

英文本是按西方學術習慣重新編寫的一本「文字學導論」。其前兩章與「重訂本」的堆積材料不同，英文本的敘述性更強。第三章對「甲編本」的改造尤為顯著，但由於是打字本的緣故，不便於徵引古文字例證，所以仍宜與「甲編本」對讀。

英文本用力最深的是第一章〈文字學史〉的梳理，占了全書一半的篇幅。第一節「引論」、第三節「《說文》以前的字書」皆為「重訂本」所無。英文本第二節「小學和六甲」說「目前對古文字學萌芽時期的歷史還沒有清楚的認識，我們嘗試勾勒出它發展的大致歷程。」這一節對小學學制做了清晰的考辨。第三節「《說文》以前的字書」主體是對劉向《別錄》佚文、劉歆《七略》（即《漢志·小學類》含班固增補）、許慎《說文解字·敘》等篇的翻譯和注釋。採用校勘、輯佚等文獻學方法，對文獻的異同做了細緻的比較。如《漢志》的「又以六體試之」，《說文》作「八體」，陳夢家認為劉歆在提高「古文」地位上發揮了作用，許慎改為「八體」更符合漢初實際，這一點得到了張家山漢簡的證明。他對文獻的注釋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個別注釋長達千言。第四節「《說文》及其先驅」可與「重訂本」〈說文解字的完成〉相對應，此節分七項解析了《說文》與以往字書的不同，及與「通人」著述的對比，突出說明了《說文》歷史地位和創新之處。第五節「《說文》學和古文字學」以《說文》為中心，梳理漢以後文字學史，其中對二徐本《說文》的研究論述最詳。

英文本第二章〈漢字的起源〉，僅占全書篇幅的六分之一。此章節目大致與「重訂本」第二章相應。「重訂本」分四節：「文字的開始」、「文字的起源」、「文名字與形音義」、「文字的基本類型」。一、二兩節的題目略嫌重複；而英文本作分別作「起源時間」、「漢字字形的由來」，則文意顯豁，但內容上兩本相近。

英文本第三章〈漢字的結構〉，內容龐雜，可與「甲編本」第三章相應。「甲編本」第三章共分六節：「論『文』」、「論『名』」、「論『意』『義』」、「論『字』」、「論『形指』」、「結論」。英文本第三章的前兩節原本是由「甲編本」「論『文』」擴展分立而來。第三節「語音」討論了「形近通轉」「同字異讀」「合文」三種現象，與「甲編本」不同的是，英文本刪去了討論「複輔音」的一段。第四節「意義」論引申義，兩書所同；「形的替換」，「甲編本」有，而英文本歸在同義字內；論同義字，英文本有，「甲編本」無。第五節「形聲」不及「甲編本」，「論『字』」論述得詳盡細膩。「甲編本」「論『形指』」一節，認為形

指字和聲假字一樣，是文字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但在英文本中，將這一節取消了。英文本第二章、第三章也有一些新的表述，這裡不再介紹。這兩章內容又被改編為《中國銅器綜述》第九章〈文字學〉。¹⁶¹

對於古籍引文，作者都翻譯為平實的英文，這對漢學家和初學者瞭解文化典籍的內涵頗有幫助。從譯文中，可以看出趙蘿蕤秉持的「直譯法」理念的影子。她說：「直譯法，這是我從事文學翻譯的唯一方法。……直譯法是根據內容與形式統一這個原則。我認為形式是內容的重要的一部分，譯者沒有權利改造一個嚴肅的作家的嚴肅作品，只能是十分謙虛地、忘我地向原作學習。」¹⁶²如《說文·敘》：「文字者，經藝之本」，「經藝」當指儒家經書六藝，可譯為「Six Arts」或「Six Classics」。陳譯為「The character is the fundamental of both classics and arts.」（頁297）。把「經藝」分開翻譯，art本指技藝，引申為人文學科，跟漢語的「藝」頗為相似。陳譯嚴格按照譯文與古籍原文字字對應，「形式和內容統一」的直譯原則。

中國文字學有自己的研究傳統和術語體系，陳氏的文字學術語有繼承傳統的部分，也有自己獨創的部分。他說「由於中國古文字學的術語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暫時有必要定義或著重新定義一些術語。」除《引論》中介紹的基本術語外，書中許多專門名詞的譯法都有開創或嘗試的意義。如「會意」譯為「assembly of ideas」，「象意」譯為「imitation of ideas」，這與他對於「意」的理解有關；「形旁」譯為「form element」或「pictographic element」；「部首」譯為「classifier（分類成分）」，前者側重表述形體或象形部件參與構字，後者強調統轄和歸類的作用。關於漢字結構的術語有：「structural analysis」（結構分析，相當於偏旁分析法）、「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結構分類，是指以義符統轄文字來進行分類）、「structural unit」「structural parts」（結構單位或部件，相當於後來的「構件」或「字符」），值得注意的是，陳夢家可能是較早將「結構」這個概念引入到漢字的類型、性質和偏旁分析中的學者。「造字」譯為「constructing characters」，也是從漢字的結構性著眼的。「假借字」譯為「phonetic borrowing」，對應他獨創的術語「聲假字」，強調對聲音的假借。這些英文術語對研究陳夢家文字學術語的理論內涵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將中國傳統學問的術語與英文相對接，這本身就起到了溝通中西學術的作用。

¹⁶¹ 陳夢家：《中國銅器綜述》，頁242-259。

¹⁶² 趙蘿蕤：〈我是怎麼翻譯文學作品的〉，《我的讀書生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84。

三 英文本《中國古文字學導論》漢譯始末

二〇一七年秋季，陳英傑老師給研究生開設的「古文字學」課上，把陳夢家的《中國文字學》列為課後研讀書目，並以此書內容為選題範圍，分別撰寫讀書報告。當時諸生各有論述。二〇一八年秋，陳老師讓我把英文本《中國古文字學導論》譯為漢語，承命很快譯出，然只是粗通大意，並不精細。二〇二〇年秋，博士生入學後，有較多時間，於是從頭重譯一過。但因篇幅較長，不易發表，一直擱置著。二〇二三年秋，將譯稿投《中國文字》，不久收到匿名專家的審查書，遵照意見把譯文訛誤修改一過，對譯者注的潦草之處，重新核對原文，注明出處。又寫了這篇〈譯後記〉對此書的情況略作交代。

關於此書之意義，¹⁶³謹摘錄專家評語，供讀者參考：

「陳夢家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其《中國古文字學導論》所闡述的雖然是與古文字學有關的基礎知識，但也包含了作者獨立的判斷和認識，有不少認識還是很有啟發性的。作為把中國古文字學介紹給外國學生的著作，書中對許多材料作了很好的處理。比如把古文引文翻譯成現代漢語，也便於理解，譯者對這古文原文注在頁腳，也是很好的做法。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時有將譯文與陳夢家相關著作進行對比，也提供了可供比較的綫索。」

「能將陳氏面對西方所寫的外文版《中國古文字學導論》譯成中文，是極其有意義的。這項工作既方便本科學生直接吸收學習，也有利於用其比較同時期其他古文字學家的相關著作，促進瞭解古文字學科演化之一環。」

譯稿受陳英傑老師指導完成。匿名專家的意見，對譯文的修潤助益良多。譯稿還受到「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首都師範大學平臺博士創新資助項目」的資助，在此一併謹致謝忱。

¹⁶³ 夏含夷認為：「這本書代表了戰後四十年代的最高學術水平。如果當時能及時出版的話，一定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然而以現在的學術標準衡量，恐怕在二〇〇六年出版就只能起到學術史上的作用了。」《西觀漢記：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12。

附錄一：英漢術語對照表

affairs：事，事務。	commentary by meaning：義訓。
antiquity：古器物。	commentary by sound：聲訓。
Archaeology：考古學。	commentary by structure：形訓。
archaic phonetics：上古音。	common characters：常用字。
assembly of ideas：會意。	common language：共通語。
bamboo slips：竹簡。	compound characters：合體字。
books-from-the-wall：壁中書。	compounds：合體字。
borrowing and lending：假借。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s：造字。
birds and reptiles script：鳥蟲書。	constructing characters：造字。
bronze：青銅器。	Carved seal：繆篆。
brush：毛筆。	day-name：日名。
calculation：計，數，算數。	Department of Secretaries：尚書。
calendrical system：曆制、曆法。	diagram：卦。
calligraphist：書法家。	dictionary：字典，字書。
catalogue：目錄。	dialects：方言。
celestial stems：天干。	ditto mark：重文符號。
Chief architect：將作大匠。	earthly branches：地支。
Chief officer of the chariots：車府令，中車府令。	educational system：學制。
Chief of teaching officials：講學大夫。	Eight classes of script：八體。
Chief of the palace eunuchs：黃門令史。	Eight trigrams：八卦。
Chief recorder：太史，太史令。	Eight style of writing：八體。
Chin-wen school：今文學派。	Eight scripts：八體。
Chinese characters：漢字，中國文字。	Europeanised：歐化的。
Chinese language：漢語。	examination system：考試制度。
character：字，文字。	extension：引 申。
classifier：部首，形旁。	feudal lords：諸侯。
combination：組合，複合，合文。	form：字形，形體。
commentary：傳，注，疏，訓故，注釋。	former Han：西漢。
	form element：形旁

Great seal：大篆。

High attendant of the imperial palace：黃門侍郎。

ideas：意，理念。

ideographs：象意，表意。

Large seal：大篆。

Li-script：隸書。

lost classics：逸經。

Lower officials' script：隸書。

Interchangeable：互通。

imitation of pictures：象形。

imitation of affairs：象事。

imitation of ideas：象意。

imitation of sounds：象聲。

imperial schools：國學。

indicative of affairs：指事。

inscribe：刻，銘刻。

inscription：銘刻文字，銘文。

inscription on antiquity：古器物銘文。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s：青銅器銘文。

knotted strings：結繩。

Ku-wen school：古文學派。

later Han：東漢。

Manuscript-style：草書。

marks：記號。

monosyllabic：單音節。

multiplication table：九九，乘法表。

Nine calculations：九數。

nine chapters of Han Gode：九章律。

Old-script：古文。

oracle bones：甲骨，甲骨文。

orderly groups：分別部居。

original meaning：本義。

painting：繪畫。

Palaeography：古文字學。

part：部件。

phonetic borrowing：聲假，假借。

phonetic commentary：聲訓。

phonetic-compound：象聲合體字，形聲字。

phonetic-element：聲旁，聲符。

phonetic loans：假借。

phonetic symbol：聲符。

phonetic writing：表音文字。

Philology：語文學。

pictograph：文，象形字。

pictographic element：形旁，形符。

Pictographic & phonetic-compound：形聲字。

pictographic writing：象形文字。

picture：形，物象，圖畫。

post-Han：漢以後。

pre-Han：漢以前。

Prime minister：相，丞相。

primitive script：原始文字。

primitive writing：原始文字。

pronounced as：讀若。

radicals：部首。

Rare characters in the old-script：奇字。

recorder：史，史官。

regulation script：正體字。

reptile-script：蟲書。

rhyme book：韻書。篇章。

rhyme classification：韻目。

rhymed chapter：篇章。

rhyme patterns：韻式。

Romanisation：拉丁化。

school-master：塾師。

script：字體。

Script for titles of book or signs：署書。

Script on credentials：刻符。

Script on seals：摹印。

Script on staves and handles of weapons：
殳書。

Seal-script：篆書。

secretary：史書令史。

sexagenary cycle：六甲，干支表。

silk cloth：帛。

simple characters：獨體字。

simplified sound：省聲。

Six arts：六藝。

Six classics：六經。

six classes：六書。

Six Dynasties：六朝。

six scripts：六體。

six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characters：
六書。

six methods of writing：六技。

six types of writing：六體。

six writings：六書。

Small seal：小篆。

sounds：聲，聲音，字音。

stone-drums：石鼓。

stone monuments：碑碣，刻石，石刻。

stroke：筆畫。

structural analysis：結構分析。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結構分類法。

structural parts：結構部件。

structural unit：結構單位。

Study of Antiquities：古器物學。

Study of Bronzes and Stones：金石學。

Study of Bronzes and Stone-monuments：
金石學

Study of Inscriptions：古器物銘學。

Study of Shuo Wen：《說文》學。

style：體，風格。

substantive：名詞。

symbol：符號。

synonym：同義。

tally：符券。

temple-name：廟號。

textual criticism：文本校勘，校讎。

the common language：通語，共同語。

Three-type-character stone classics of the
Cheng Shih of the Wei dynasty：魏正始三
體石經。

turning and pouring：轉注。

types of writing：書體。

unit：單位，部件。

Walls of Confucius' house：孔壁。

Wei Shu school：緯書學派。

word：詞。

word-book：字書，篇章。

word-groups：詞族。

word-group classification：詞族分類。

writer：書手。

writing：書，書寫，書契，文字。

Written form：書面形式。

附錄二：原書誤拼譯名更正表

中文名	原書誤拼（更正）／原書頁碼	漢語拼音
內則	Nei Ts'e (Tse) p.264	Nei Ze
南齊書	Nan Chi Shu (Ch'i) p.268	Nan Qi Shu
李譔傳	Li Ao chuan (E) p.268	Li E Zhuan
王僧虔	Huang Sun-ch'ien (Wang Seng) p.271	Wang Seng-qian
別錄	Pi Lu/Pi Lo (Pieh Lu) p.272/p.273	Bie Lu
訓纂	Hsüan-ch'uan (Hsün-tsuan) p.275/p.279/p.303/p.304/ p.305/p.306	Xun-zuan
刑法志	Hsin Fa-tzu (Hsing Fa Chih) p.276	Xing Fa Zhi
象形	Hsiang hsin (hsing) p.285/p.313/p.364	xiang xing
尉律	Wei Li (Lü) p.288	Wei Lü
秦近	Ch'in Ching (Chin) p.289	Qin Jin
別通	Pi-t'ung (Pieh) p.290	Bie-tong
程邈	Ch'eng Mo (Miao) p.292/p.293/p.294	Cheng Miao
張蒼	Chang Ch'ang (ts'ang) p.295	Zhang Cang
皋陶謨	Kao Yao Mu (Mo) p.296	Gao Yao Mo
毛亨	Mao Kung (Heng) p.298	Mao Heng
揚子雲	Yang Tzu-yüan (yün) p.304	Yang Zi-yun
彥均	yen-yüan (chün) p.304	Yan-jun
張懷瓘	Chang Huai-huan (kuan) p.304	Zhang Huai-guan
漢晉	Han and Ch'in (Chin) p.305	Han and Jin
家訓	Chia-hsüan (hsün) p.305	Jia-xun
經籍	Ching-echieh (chi) p.309	Jing Ji
唐玄度	T'ang Hsien-tu (hsüan) p.312	Tang Xuan-du

中文名	原書誤拼（更正）／原書頁碼	漢語拼音
譚長	T'ang Ch'ang (T'an) p.314	Tan Chang
周盛	Chou Shen (Sheng) p.314	Zhou Sheng
衛宏	Wei Heng (Hung) p.314	Wei Hong
尹彤	Ying T'ung (Yin) p.315	Yin Tong
張林	Chang Ling (Lin) p.315	Zhang Lin
寧嚴	Ling Yen (Ning) p.315	Ning Yan
桑欽	Sang Ch'ien (Ch'in) p.315	Sang Qin
讀若	tu-ju (jo) p.315	Du ruo
總目	ts'ung-mu (tsung) p.316	Zong Mu
嚴峻	Yen Chuan (Chün) p.317	Yan Jun
曹產	Ts'ao Ts'an (Ch'an) p.318	Cao Chan
李鉉	Li Huan (Hsüan) p.319	Li Xuan
李陽冰	Li Yang-ning (ping) p.319/p.320	Li Yang-bing
偏旁小說	P'ian P'ang Hsiao Hsüeh (shuo) P319	Pian Pang Xiao Shuo
徐鍇	Hsu Ch'ieh/Hsü Ch'ien (Hsü K'ai) p.319/p.326/p.327	Xu Kai
楚金	Chu-ching (chin) p.319	Chu-jin
經籍志	Ching-chieh-tzu (chi-chih) p.321	Jing Ji Zhi
平津館	P'ing Ching Kuan (Chin) p.325	Ping Jin Guan
類函	lui-han (lei) p.326	lei-han
黃公紹	Huan Kung-shao (Huang) p.326	Huang Gong-shao
熊忠	Shun Chung (Hsung) p.327	Xiong Zhong
類篇	Nui P'ien (Lei) p.327	Lei Pian
張自烈	Tsang Tzu-lieh (Chang) p.328	Zhang Zi-lie
正字通	Ch'en Tzu-t'ung (Cheng) p.328	Zheng Zi-tong
桂馥	Kuei Fo (Fu) p.330	Guei Fu

中文名	原書誤拼（更正）／原書頁碼	漢語拼音
和帝	Hou-Ti (Ho) p.333	He Di
郡齋	Ch'un Ts'ai (Chun Chai) p.335	Jun Zhai
呂大臨	Lü Ta-ning (lin) p.335	Lü Da-lin
鐘鼎	Ch'ung Ting (Chung Ting) p.335	Zhong Ding
金石	Ching Shih (Chin) p.335	Jin Shi
阮元	Jüan Yüan (Juan) p.336	Ruan Yuan
歷城	Li-ch'en (ch'eng) p.337	Li-cheng
河北	Hopeh (pei) p.337	He-bei
山西	Shansi (hsi) p.347	Shansi
金文編	Chin Wen P'ien (Pien) p.366	Jin Wen Bian
妣	p'i (pi) p.371	bi
形聲	hsin-sheng (hsing) p.395	Xing sheng